

# 民主台灣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訊 1981.4/5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 25

# 編 者 的 話

兩年前美麗島雜誌第二期曾刊登了一篇由葉大雄編譯的文章〈揭穿韓國經濟奇蹟的神話(上)〉，由於這篇文章毫無保留地揭發了南韓經濟成長背後黑暗的一面，因此立即遭到南韓駐台大使館的抗議。美麗島雜誌因而暫停該文下半部的刊登。後來高雄事件發生，美麗島雜誌被查禁，〈揭穿韓國經濟奇蹟的神話〉下部因而一直未能問世。本會最近終於取得了該文的原文全部，並將其精華部份翻譯出來刊登於本期。由於南韓的經濟發展道路與台灣的很相似，透過該文，讀者對台灣經濟發展情況必有更多的認識。限於篇幅的緣故，本文的上半部就予略去不予再登，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美麗島雜誌第二期。

上期我們轉載了一篇「張春男的聲明」。最近本會又收到了張春男三月二日在台中法院的答辯狀。這份答辯狀不但有力的駁斥了國民黨對他的控罪，也向大家說明了：為了迫害一個反對者，國民黨當局是會使出怎樣卑劣的手段的。本期轉載了這份答辯狀的全部，關心台灣政治迫害的朋友不可不看。

這期《瞭解台灣專欄》裏，我們選登了李文仁的〈回鄉行的見聞和觀感〉。這是作者於去年底回台小住一段時間後回到美國後所寫下的一些見聞與觀感。〈到民主之路〉一書是最近當選立委的黃煌雄先生近著。該書出版後即被查禁。本會幸能獲得一書，並決定將該書在美翻印推出。為了使海外讀者能「先睹為快」，我們這期選印了該書其中的一篇〈當前民主運動的歷史任務〉。該書不久即將與讀者見面，有興趣的讀者請密切注意。

本期的《文化思想欄》裏，有文凡先生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該文從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背景，具體地討論了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個派別的基本內容和中心思想。有興趣於社會主義研究的，這是一篇難得的佳作。

〈民主台灣〉的園地是大家的。我們請所有關心台灣民主前途的朋友都來一起耕耘。歡迎各界人士投稿。來稿如予採用，當即奉贈本刊一年。

---

敬啟者：

民主潮流浩浩盪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的特徵之一，便是輿論盛行，百家齊鳴。是以為加強海外輿論，本會決開設

「民主之聲」

電話廣播站。首站設於洛山石磯，共分兩台，電話：

(213) 282-8029 (台語)

(213) 930-1678 (國語)

第二站設於芝加哥，電話：

(312) 667-2745

敬請收聽，並於聽後，在30秒內，經由電話，留下您的寶貴意見及消息。謝謝您。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一九八一年五月

---



# 回鄉行的見聞和觀感

李文仁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筆者回到台灣小住了一段時間，除了探親訪友之外，就是利用機會瞭解一下近年來各方面的發展和變化。回到美國以後和朋友們談起此行的觀感，多半得到熱烈的反應，個人固然為朋友們對故鄉的關懷感到欣喜，也為討論中湧現許多共同的觀感而鼓舞。為免得純粹流於言談，筆者以寫報告的心情嘗試著把一些觀察記錄下來，供更多關心台灣而長期不曾回去過的朋友們和同鄉參考。為著時間實在有限，筆者放棄了綜合整理的企圖，而只粗糙的就不同項目分別記述主要的見聞（客觀見資料）和感想。体裁的不倫不類和行文的粗略，就只能祈請諒解了。回到台灣正好是去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剛結束的時候。打鐵趁熱，就先從選情談起，首先列舉一些資料，然後發抒一些個人看法。

## 1. 選舉：

### a) 資料部份

i) 南票當晚七至十一時，蔣經國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陪同一直守候在中央黨部的一間特別辦公室內，透過電腦的終端機瞭解南票的結果。當晚在七時以前，國民黨已對全台灣的選情作出了一份詳盡的預測呈報給蔣。預測中對台北市的4情況，尤其是周清玉得票的情形，以及台北黨外票源的分佈都估計得十分準確。互南票全程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蔣抽空主持，出席或指示了任何會議或會報。（按：一切證據似

都表明在各鄉鎮以上的階段，在計票上，選舉的公正性似乎存在。但由於計票中心嚴禁“閒人”（包括記者）進入參觀，中間結果又不公佈，因而令人存疑。至少“公開性”是談不上的。

- ii) 台北市大安区某投票所的作業（擔任南票的友人告知）是完全符合規定的，作業人員中有不少是普通居民因各種原因被“抓公差”的。這個投票所至少在該區是十分average。
- iii) 投票前某商界友人的母親接到近十通電話，要她投周清玉或其他黨外一票，因為“要給他（K）好看”！
- iv) 投票次日某大陸籍友人的母親到市場買菜，小販主婦們談起，大部份都說投了周清玉一票，因為“她好可憐呵”！
- v) 選舉後一星期，三重公車北門線（十路7）的司機在車上大放黨外人士競選講稿錄音，被乘客告到派出所，由警察沒收錄音帶並“申誡”了事。  
（以上是個人認為絕對可靠和絕對誠實的資料）。
- vi) 台北縣南票特怪，可能原因有二：①作弊②作業人員初次發現必須負責把票算正確，因而有反覆計票的情形，延誤時間。台北市另有一南票所在票數核算上有問題，主管要求更動票數以“符合”帳目，被作業人員峻拒，因後者怕背上黑鍋，“划不來也”在以往一定全削足（計票）適履（發出的票）。

vii) 某新生代助選員資料：黃順興一度想退出競選，因中部地區買票極盛，黃自覺沒把握，亦且羞其不顧顏面，買票的手法翻新，絕招之一是把西裝上衣內面縫上媽祖像，在付錢後把像“亮”給“選民”看，並說“你看到了，媽祖作証，不投是要受罰的”，效果宏大。

viii) 中部地區選情熱烈，許榮淑初期表現不好(常不能自制，流淚，因而演講欠缺氣勢，與他平常為人表現相反)，但經台北黨外新生代南下助陣，重擬講稿，重作海報後，與張春男、黃順興在台中公園聯合舉辦的政見發表會引起極大共鳴。氣氛熱烈，情況甚至超過暴動爆發前的高雄美麗島集會。在黨外甚至覺得再一次暴動是勢不可免的，因而憂心忡忡。在公辦政見會期間，許、張、黃取聯合作戰態勢，聲威極盛，某國民黨候選人在台上說到激動處(自以為控制了場面，問群眾道“……所以，你們說，政府該不該下台？”不料群眾大呼“應該”，他忙問：“下台了，誰做呢？”群眾說“你”，該人急忙鞠躬下台。

(以上資料，個人認為，至少基本可靠，但有失真的可能)。

以分析批判性部份：

i) 根據黨外看法，這次選舉國民黨把精力集中在中部地區。原因是，台北原是國民黨馳名地區之一，但周清玉、黃天福等傳單內容並不激烈，初期政見會場面亦不火爆，國民黨與黨外，特別是新生代有良好溝通。對台北市中產階段的反對暴亂的態度也有深刻瞭解，因而很快就

對北部地區放心(按：所有人一致認為，國民黨的主要目標是一次“平靜”的“正常”選舉，以對內對外說明情勢之穩定；其他的，如席次、黨外目標等，都退居次要)南部無首，估計也不是為患。中部則相形之下，成為勝負所繫的關鍵。在中部操縱的手法有三：①作票②買票③斷票。此次似是以斷票(合法)和買票為主，作票次之。所謂斷票，就是把選民劃為農民團體，工人團體等職業團體，因而喪失投普通候選人票的資格，以往黨外力量較盛，組織較好，可發動宣傳讓這種選民去及早登記為“普通選民”，轉換投票資格。但這次則無力普遍照顧，光黃順興一人，據僅估計，已因此被“斷”送了七萬票以上。買票已如上述。國民黨在提名登記的時候就明言拿不出“兩千塊”(一塊即一萬之意)的人，別想競選。這次當選人中不含文盲(按：監委的賄選是公開的祕密，一票看交情，關係自五百“塊”到三千“塊”不等。文票即可保證當選，尤清律師可能是較例外的，他也是第一位黨外選上的監委)，作票缺乏有力指証，但跡象則很多，最主要的是①中部選區一千多票箱中，最早開票，完畢的兩百多箱(並非都集中在黨外優勢區域)就給了許榮淑的五萬票，而到全部結束時，許卻只得七萬票而已！②其中竹山鎮，許的政見會極成功，但開票結果卻只有三百多票③又台中市區域(連同台中港)一向約有二十萬左右黨外票源，這次黨外儘管有極成功、密集的宣传攻勢，卻只得四萬多票而已。所以作票的

疑雲在中部地區最厚。(按④⑤兩項也可能是買票，斷票的結果。至少台中市其他資料來源對作票一事多未給予肯定的印証)。

至於北部地區，作票傳聞也有，比方北縣開票特慢，北市國大代表與立委的廢票，數目相差數千票(按：兩種票是印在一種紙上的)等。不過缺乏其他資料的直接佐証。南部、東部地區不詳。

個人觀察選後的跡象(未能趕上選期)在台北、台中兩地(至少)這次的選舉在“熱烈”(或“火爆”)方面似與 77 年中選事件之前的地方選舉並無二至，因此以“降溫”而言，國民黨應算成功。其次，就是選舉本身的進步而言，國民黨或沒有達成之精心設計的那種宣傳效果，但社會上一般的確不大聽得到對作票的指控(尤其在台北市)，並且即使是作這樣指控的人也明言國民黨這次在全台灣動手腳的程度比以前降低了很多，個人以為不論真相如何，這種 consensus 的確與几年前一般人一提到開票時的立即反應有顯著差異，而這種差異本身對國民黨就是莫大的勝利，(在建立 image 上面)。但在另一方面，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等人的當選，對國民黨是一記响亮的耳光，也大大鼓舞了民間的情緒。但個人由此得到的印象是這對國民黨可能並非全然不利。以台北市而言，中產階級(參見下文經濟一節)在理念上是反國民黨的這一毫無疑問，他們一定要推國民黨向改革的方向走，一定會在相當程度上與它對抗，美麗島家庭的勝利既反映了這個階層的力量，也相當程度地滿足了它在現階段的政治要求。就這

一言，周、許、黃的勝利在客觀上也是符合國民黨之中那些走中產階級路線的所謂開明派的利益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個人以為，從政治對抗的降溫，國民黨之建立一些新形相以致民主力量之略得舒張，總合起來提供了一個政治立場中新平衡的均衡，而這均衡是較契合於台灣社會經濟體現階段所處的態位的。這一個短期均衡可以維持到社經的發展與政治體制的第值積累並擴大到下一個臨界值的時候。這期間至少應有三年到五年。(按：這種政治—經濟的異化和國民黨一黨外(或新民主運動)的對抗二者之間的對映，以及後者的向上發展的週期循環本身，都構成一個有趣的研究題目。尤其是最近十五年間的變化——因在那之前台灣經濟在剔除人口成長的因素之後是基本上停滯的。就中產階級言，若國民黨本身順應目前趨勢無大變化，則下一個對抗高峯可能仍只是在政治實力的量變的大階段之內而已。中產階級之外的情形個人不詳。就建築工程界小姐等而言，個人見聞是多半不關心政治，少去政見會，亦少投票。計程車司機則熱心得多——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多半開者有其車，事實上是更接近中產階級的。就聽聞所及，農村的投票仍多半受親族鄰里以至各種半經濟、半社會(如農會、合會的團體關係)所左右。黃順興的落選很為知識份子惋惜，有一黨外人士說，黃的競選策略過於守舊，北部新生代見拒於黃，再加國民黨的斷票，因而落敗。若黃的聲勢夠大，如許榮淑般，則國民

竟也不敢不讓他當選云云。個人傾向於此說，因國民黨處心積慮要搞他固是事實，但這也是向來如此，縱使這次特別急些，若黃不露破綻，國民黨也不見得敢“作”掉他。

## 2. 經濟和社会：

個人總的印象是，台灣經濟的活力相當大，戰後出生或受教育的一代完全崛起。自自治時代以來的現代化基礎（尤其是那些所謂 institutional factors）充份發揮作用。台北市日趨香港化，高雄市日趨台北化，而整個台灣則又顯示出日趨都市化的跡象。（高速公路使得整個西海岸基本上聯成一体了）；與此同時，日本的影响力量顯然在逐步擠出美國的固有力量，不論貿易、投資、貿易甚至經營管理，美國作為 role model 或代表第一流的地位顯著式微了。几家最新、最豪華（比方筹建中的香格里拉大飯店）的觀光旅館都以與日本大飯店合作為号召；台北希爾頓顯得灰暗多了。但是更顯著的是台灣企業家的興起，以及國民黨對台灣經濟和社会繼續向前發展所起的阻力。最後，物價的昂貴是驚人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大体上都超過了美國小市民階層的物價水平。（台北、台中、高雄各百貨公司的商品價格一般都比 K-mart 的對應商品價格高，常貴一半以上）一般人的所得比美國低得多，則花費之大方，則有過之。以下列举一些实例作為註脚。

a) 市政：台北市東區發展極快，南京東路沿線直到松山，信義路，仁愛路，忠孝東路也是，一半以上都是十層以上的樓房。許多建築在設計、建築上都十分考究，遠勝漢城。繁華固繁華矣，海外遊子不免問曰：為什麼不蓋二、三十層的呢（防震不成問題）？以星、港、漢城為例，都市用地日貴，全蓋十二、三層的不太浪費了嗎？答曰：飛

航管制條例不允許，因松山機場在附近；而該條例訂於數十年前，是為螺旋槳飛機的起落需要而制訂的！因這老朽，台北東區三、五十年內只好永遠被浪費了一半。額外昂貴的房租成為不可避免的後果。

b) 市政：台北交通極亂，小汽車增加極快（當年同班同學在台的，已有一半買了自用車，這些人中，三分之二是靠自己的錢），許多雙線道經常都被自動的當作四線道用。高雄市交通更亂，入夜有 triple parking 的情形。台北市長李登輝顯然是相當在觀念上夠格的人，聽聞他不少在系統管理上的作風。環城快速道路建成了部份，也拓寬了許多道路。但交通秩序之差，都市治安之壞，卻除了一些“物質基礎”之外，更有人謀不臧的成分：警政敗壞，政府行政效率太差。如同飛航管制條例一樣，要更新這些東西立刻涉及中央政府和立法機構整個“根本大計”，其構成其運作，其效能。這樣的例子無時無地沒有，也可說無人無日不用到它的零頭。作為一個小例子，桃園機場在設計上大而無當，除了部份反應開發中國家難免的炫耀心理（貪大求洋）外，更肇因於“安全需要”。因而旅客的便利只能在設計時被完全方面性推掉了。而那些安全設計卻在事實上既不需要，更可以找到兩全其美的代替方法，其癥結何在於只有官主沒有民主。

c) 風氣：台北市的風氣自三方面可謂敗壞：1. 拜金（即第一是錢，第二還是錢，……第几仍是錢），使得敬業樂群的工作道德不易建立，拿死薪水，但其工作对社会為必要，並有貢獻的人難安其位。一般青年更容易隨時處在破暴發了的友輩“拿錢打死，打翻在地”的壓力之下。能不受這種陰影左右的人，多半是①家裏有錢②事業有前途（如搞電腦、當經理、醫生）。

④ 党政实权新贵 ⑤ 党外。第四种人若窮，暴發戶也不敢欺他們，即使欺他們，政治上的使命感也是以作為精神支柱。(不过，必須說明，党外很少不搞生財的)。2. 奢侈。宴飲的花費簡直是可怕，這使得儲蓄→資金積累→投資的過程達不到应有的強度。其他方面的“不節儉”一般而言似都在普通老美之上。台灣發展的三大文化因素：勤力與儉儉似已失去其一了。(当然，這是都市的現象，農村情況不詳)。3. 犯罪。色情的泛濫是一年甚於一年的。中山北路那幾條通地地區已實質上成了“高級”風化區了。有些行為介於色情與不色情之間的，如理髮按摩則可說是遍地都是了。不用說，這對一個社會的健全發展是有妨礙的，比方，會增加前二者的傾向。其他都市犯罪情形則遠比紐約好。造成以上三種風氣的原因自然很多，比方觀光差，貿易，經濟快速成長都市發展的通病，農業社會遺風等。但以個人認為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社會缺乏文化重心和精神支柱。簡言之，缺少金錢之外的成事目標和理想。(故党外較能免疫)。如果說老美有宗教作為道德泉源，有立國兩百年不替的政制和社經方向作為其 Yule model 和信心基礎(故他們歷史上的英雄在今日仍是有效法的英雄)，則台灣顯然並無。除非幹党外，否則政治只能提供骨骸；本身政制，不能提供自豪。本身社經，歷史不能提供 alternatives，未來方向又是空白：三民主義佔了名(反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佔了實，因此之故與資本主義相對應的那些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哲學、經濟思想和理想並不能站出來扮演精神支柱的角色，無怪乎只剩下錢了。而拜金恰好又是向下契合現階段台灣資

本主義，向上契合政治現實的集火庫，自然向橫裡“資”長奢侈和犯罪了。但是必須說，個人所接觸到的樣本中，受壓力的人固佔多數，但多半仍是勤力整齊努力工作的人。因為，至少在目前，他們多努力一分仍有多一分的報酬的。

- d) 例子之一。造成台灣經濟活力和潛力的例子之一，是一家電腦公司，初創於七五年底，成員共四人(連打字員)。負責的兩人是大學電機系畢業生，先在工廠工作了一陣子。白手創業，代理當時還少人問津的微型電腦。不到五年，中間經財閥的收購，公司規模已超過台灣的 IBM 而執業界牛耳。初訣：進口零件，設計、製造，推廣台灣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產品之一：Chinese CRT terminals + Chinese Programming Language + Chinese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這樣的整套系統是中共完全沒有辦到的，不論在硬體、軟體或觀念上。由於社會進步所推動的強烈需要，而他們又掌握了滿足這些需要的 Know-How，因而即便在陳腐的衙門和公營事業，他們也搶到了不少生意。(國民黨作生意很動人，自另一角度描繪出了國民黨臃腫痴肥的身體被勤勉的小民抬著推著往前跑的情景。什麼時候它才走不動了或不肯走了呢？或小民們終於掙脫被它綁住在一起的鎖鏈而輕身飛奔向前呢？)，國民黨的拖累又一例子：為了“安全”與電信事業國營的緣故，time-sharing 在台灣無法推廣(範圍極有限)。以致大如中鼎公司的大電腦：Cyber 72 多半閒置，小如這間電腦公司的即時作業系統有如跛腳的矮人。
- e) 例子之二。大貿易商是國民黨財經系統中一派所推動的，有從起點發展就困難重重。首先，財政部反對，認為廠家有漏稅嫌疑(因大貿

易商直接由大廠家設立)；其次這些老板原也打算趁機攫取額外貸款；最後這些貿易商根本不夠大(多為一億台幣資本)，既缺乏專門知識(與各廠家比或與人的專業貿易公司比)又無財力建立專業技術。但為了這是“政府決策”(看來小蔣是支持的)，“威信所繫，這些公司都不獲准開門。個人對其中之一有機會瞭解內情，印象所得，公司職員多半年青肯幹，對“大貿易商”這字樣觀念抱有熱忱，但因先天錯誤，這批人力財力勢必被浪費掉。這是國民黨的“大有為”施政的一個例子。

f). 工資與物價。公司職員最低起薪(如女秘書)為 N.T. 7,000 左右，小主管的為 N.T. 20,000，工程科系畢業生起薪一般約為 N.T. 10,000 ~ 15,000，特優者不計。國中教師一般為 N.T. 15,000 左右(中等年資)，校級軍官與若任公務員大體與此相當(有一 range)。軍校畢業生，中尉約有 8,000，白領中，待遇較好的行業(金銷售人員不計)，就三十上下的人而言，最多可能達到 N.T. 30,000 (如小經理，小組長)一般外務員，底薪一般在七千到一萬之間。建築工一天在 1,200 左右，農村兼業農民數目超過專業農民，而土地合併成大農場，企業化經營，已在部份地區出現。

物價極貴，以台北言，蚵仔煎小小一盤售價 N.T. 40 元，咖啡一般 60 元一杯，水果一盤一般在 30 ~ 50 元之間。喜宴酒席一桌普通的約要 N.T. 4,000 元，但 N.T. 10,000 元以上的也非常普遍。國產襪見衫如南洋牌一件一般都在 1,200 以上，略貴的要賣 1,800 左右。一些有人駐唱的餐廳，每人最低消費額多在 500 元以上。福特六和的 1200 C.C. 雅士最終售價(含 options)至少在三十萬以上，台灣三陽

裝配的 Honda Civic 最為暢銷，一輛靠近四十萬。進口車售價恒為各該國內價的三倍以上。北方 Buick Skylark '80，除 standard 外只加 air conditional 和 stereo，售價 86 萬。電器也多比美國價格貴出一到三倍。房屋價格按建坪算，都市比都市，台北至少不比美國便宜。相對言，便宜的似乎只有：公車(5或 6 元一段，若搭遠途用上三段(北方天母到大安區)再加轉車則票價可能比美國那些不按段收費的(城市公車更貴了)，計程車(起價 20 元)，房租(三房一廳約 4000 ~ 6,000，豪華者不計)等有限項目。書籍價格大體不比美國貴，但十分接近，有時也會超過。但是一個有意義的現象是，個人所接觸的範圍內，可說沒有人對物價上漲感到擔憂，都相信物價漲收入也漲，生活不會變得難過，這是個人從老公務員中所得最深刻的一個印象，也是與數年前最不同的一點。

### 3. 政治，文教與其他。

在這一節，將列舉一些見聞而避免個人的感想，免得已太長的篇幅變得更長。

- a). 桃園機場的海關，進出口安全人員甚至機場“協調中心”(安全部門指揮所)的幹部大半都是台籍。外省籍只有主任及少數幾名工作人員。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科長級及以下絕大部份是台籍研究所和大學的畢業生。主任一級起，隨職位漸高，台籍漸少，省政府各廳處的幹部，除最高主管或机要，安全部門似仍以外省籍佔優勢外，大體上都是台籍。在那些單位以及地方單位，外省籍的職員遭歧視，久久不得升遷的事情，已不是新聞。
- b). 省籍的差異顯著存在，但並未到嚴重的地步。



一方面，黨外新生代，有許多外省青年，台籍幹部也成為國民黨的黨政中下層主力，因而省籍差異在政治上似不嚴重；但另一方面，外省青年極難被本省公司僱用，而國民黨對黨外的態度也顯著地（統計上）因省籍而異，所以地域差別又是一個明顯存在的事實。據說高雄事件次日，國民黨還未擺明鎮壓姿態時，台南市某國中有教師公開在辦公室歡呼美麗島“幹得好，把外省人通通趕下海去”。就主流言，至少在都市的新世代，事實上的“台華”意識似居支配地位；即“我們都是台灣華人”。台華一詞自然未形諸筆墨，也極少聽人提起，但事實上這個概念已成形似不容置疑。

c. 龍的傳人已少有人唱，代之而起的是劉家昌的“中華民國頌”，後因跳機事件，此歌似也壽終正寢了。有一首已流行了一年多，仍在風行的歌，詞曰：“我生在這裏，我長在這裏，這裡是我的國家——，不答別人欺侮她——”。名義雖是愛國，但角度卻已與傳統的愛國大大有異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是“台華”或台灣的中國人（華人）意識的一個註腳。

d. 黨外新生代中，以林正杰聲望最高，隱然成為龍頭。周清玉競選幾乎完全依賴一批最小為高中生，最大為研究生的新生代助選，許榮淑亦然。總合來說，這批人絕大多數年在35歲以下，而且生生不息，自中壢事件、中央增補選，到去年底的選舉，每次面孔都不同。林正杰等人籌辦一份政論雜誌，暫時名稱為“進步”（取自梁啟超故事），初步獲閩中諒解，可能在二月或三月出刊。

e. 康寧祥結交各方人物，包括親國民黨的人，工商人士更多。康預言再過半年，地方選舉時，國民黨會大舉抓人，葉島雷、高浩遠兩案件是用來對付

去年底選舉的前奏曲而已。抓那些人，資料並未提及。

f. 年輕人對中共，中國大陸感到興趣的不多。個人只遇到過一二次被問到大陸留學生等的事例。當談到時，大家都很注意，但不談時，又沒有人會去理會。印象中，不論省籍，年老的人對大陸的興趣遠較三十歲以下的人大，對貿易、通商，一般人反應積極的為多，消極的少。理由多半是“我們比他們強，貿易對台灣有利”。但凡涉及主權，則一概免談：“台灣自有自己的前途”，是典型反應，服役的朋友一致認為，反攻大陸免談（軍中訓練也不提），但保衛台灣則士氣必定有士氣。為保台，若能產生制衡效果，則聯俄也在所不惜。”是另一典型看法，但一般多認為不到最後關頭，不應走這步棋。走了也未必有效。對“和談”的態度多半是消極的。典型態度為“和平共存很好，但不可信賴中共。但必須指出，這些討論並不熱烈，若非個人有意試探，似乎無人 bother to care about China。

g. 文化者表現上，台灣的確已相當西化（正如日本、香港之西化），但“崇洋”則似乎表現得不如記憶中強。本土藝人（現代舞、歌曲、繪畫等）得到頗大肯定，表現得也有自信，可能是本身就有的，所以不太需要去崇外面的某類似東西吧！在“本土文化”方面，文學創作仍在發展（如鍾肇政），校園歌曲則似乎景向有限（最多只限於校園裡面部份有心的學生），反而言之，因為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性質的文化活動顯著加強了。除了前面已提到過的成套成套的大部頭的精裝精印的書籍，女星樂、旅遊性質的專門雜誌如兩隻春筍外，一些現代舞和音樂會等也都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觀眾。一個本土舞蹈家在國父紀念館的兩天演出，可以

場場爆滿，週末的新公園露天音樂會(遺憾的是仍未能經常、定期的舉行)一如客家民謠演唱會(這是本土文化)——可以吸引成萬的觀眾冒微雨參加。看到企業式的文化事業(尤其出版界)興起令人特別感到新興中產階級的呼吸；而在拜金的社会中仍有一些年輕人因著理想(但懂得採取資本主義的marketing手法)為戲劇、舞蹈等工作更令海外遊子在情感上激動。“西化”、“崇洋”、“鄉土”、“工農兵”等先馬式的評價在浩浩蕩蕩奔騰而來的現代工商經營的經濟發展面前顯然失掉準確的意義了。“We play their games, and beat them!”這是基隆的聯合眼鏡公司的豪語——他們年前剛完成併吞德國蔡斯眼鏡的工作(目前全世界鏡片不論用的是什麼商標,近一半是這家聯合公司的產品!)在那些以本土中產階級作基礎而興起的西方形式的本土文化活動和產品面前,筆者不禁迷惑了:那些“論戰”當真正站在台灣人民,台灣社会的立場上的時候其 points 到底植根在那裡?



是該結束的時候了,返台短短幾週,情緒和認知來回激盪在好與壞的兩個極端之間。而時間愈久,愈加清晰浮現的只是一個意念:台灣人民的幸福,只能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裏,就像現實揉雜著許多好與壞的質素,未來也一定面臨嚴峻的考驗。只有全面的民主化才是最有力的手段和最燦爛的目標。

質詢  
阿歪從政記

以下宣讀本席的質詢稿……



為平定天下局勢化解仇恨便能國富民安……



放眼天下武林只有少林武當二派足以担此重任……



該死的!你只是抄古龍的武俠小說!!



Calo 4/8/13

八十年代·第二卷·第四期·民國70年4月

# 張春男的自辯書

資料組

"...如果選舉言論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判罪的話，則選舉就只不過成爲一個抓人的陷阱而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第	號	第	號	第

被告	張春男	男	40	農	員村街五號	南區路(一)
案由	刑事					
案號	70 年 月 日 訴 字 第 一 三 八 號					
辯護人	張春男					

說明：一、本狀係被告張春男向本會提出之自辯書，經本會核對無誤，特此聲明。  
 二、本狀係被告張春男向本會提出之自辯書，經本會核對無誤，特此聲明。  
 三、本狀係被告張春男向本會提出之自辯書，經本會核對無誤，特此聲明。  
 四、本狀係被告張春男向本會提出之自辯書，經本會核對無誤，特此聲明。  
 五、本狀係被告張春男向本會提出之自辯書，經本會核對無誤，特此聲明。

在台中地方法院最後的陳述

首先我要請鈞庭看這個由選委會送來當證據的我的演講譯文，上面已經公然寫著「陰謀份子」張春男，其次我再請鈞庭看這些我在各場政見會的言論摘要，早就統統列入所謂「不法言論摘要」裏了。

其次我要說明，這些送來當他我犯罪證據的譯文及譯文摘要，到這都是錯誤百出，其意圖到極點，而是卻錯誤友同一個方向，就是對我不知的方向。至於發言摘要，則全為故意只摘一小段，而且而去掉去尾的稿在聽起來最令人容易產生誤會，其目的，以達到斷章取義，入人於罪的目的。

< 編者按 >

選舉結束後，黨外立委候選人張春男即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被控以「煽惑暴動叛亂」罪。上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半。下面轉載的是本會最近收到的張春男在台中地方法院的答辯狀。這份答辯狀不但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當局對他荒謬可笑的控罪，也向大家說明了國民黨是用什麼卑劣手段去陷害它的反對者。

首先我要請鈞庭看「這個由選委會送來當證據的我的演講譯文，上面已經公然寫著「陰謀份子」張春男，其次我再請鈞庭看這些我在各場政見會的言論摘要，早就統統列入所謂「不法言論摘要」裏了。

其次我要說明：這些送來當做我犯罪證據的譯文及譯文摘要，到處都是錯誤百出，荒唐到極矣，而且都錯誤成同一個方向，就是對我不利的方向。至於錄音摘要，則全為故意只摘一小段，而且都去頭去尾的摘在聽起來最令人容易產生誤會聯想的情況，以達斷章取義，入人於罪的目的。

本案即為追究我三個月前的競選言論，竟自開始傳訊即把我羈押，至辯論終結為止，都不使我有再聽自己演講原文錄音的機會。而且起訴書既寫明有我演講全文錄音為証，竟從檢方傳訊起至今天，經我一再要求播放全文錄音，仍然全未放過一次。既然是審判我的競選言論，竟都以錯誤百出的譯文與摘要，作為替身，而為審判的證據，此何用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的演講被起訴部份，檢察官在我的追問下，已承認是由我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九場演講中各取出一個句子，加以联接而成。而且這九個句子中，多數已非我原文，是已被修改過了。用這種斷章取義，割裂而來的短句，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拼湊而成一篇語意全新的短文，企圖以偷天換日的手法，羅織誣陷，欲判我以七年以上徒刑，實不知天下間竟有這種不講理的事，更不知天理何存，公道何在。

在各地各場政見發表會中，我一再強調改革必須以和平的選舉方法，竟僅因在主張必須用和平手段改革時，偶而提及百姓手無寸鐵是必須和平改革的最簡單理由之一，就被檢察官吳國愛指為是寓意必須武裝革命，而指稱我在煽惑判亂，

而且好像也已蒙審判長黃武次的採納，而欲據以判處本人重刑，這實在是比狼要吃小羊找不到理由時所說的不成理由的理由更為沒有理由的理由了。

起訴書所列證據，除斷章取義，割裂拼湊的演講詞之外，僅為兩句宣傳車看板標語和一段宣傳播音，其所以被指為有問題者，僅因有「推翻專制」、「打倒暴政」、「專制獨裁」等句子，這類標語，從前在校常喊，街上常見，因為類似這種句子為國文孫中山先生之所常言，總統訓詞之所常見，竟据此把我起訴，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至於變造譯文中之「苦海中普通百姓」並非我宣傳播音原文，其原文已經在前次調查庭，當庭播放錄音帶聽清楚為「無加入黨」而非「苦海中」。這是當日當庭有耳共聞的事，而受命推事楊南江也表示已聽清楚為「無加入黨」而非「苦海中」，並經我要求當庭記錄在卷可查。想不到剛才在我堅持要求下再度當庭播放時，檢察官（吳國愛）竟能在全庭那麼多人聽到的情形下，還強詞說他聽到的是「苦海中」而審判長（黃武次）及陪席推事（侯斐君）竟能當場表示聽起來不是「無加入黨」，而上次已聽清楚為「無加入黨」的受命推事（楊南江）竟能在場而閉口不表示意見，這樣的審判，這樣的審判，真是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這個追究選舉政治言論的案子，辦案之不公平，採証之不公道與起訴之草率，已創下世界司法史上的一個最惡劣紀錄，起訴書中並無任何有效的直接證據，都是把變造的語句，拿來組合，

再用所謂「寓意如何」、「諷喻如何」、「前後  
對照印證以觀」、「顯然如何」來歪屈解  
釋我的競選言論。如果可以用這種方  
式加罪於一個人，那麼全台灣只有不會說  
話的小孩或啞吧可以免於遭受這種  
災難，只要是會說話的人，不幸為選為  
打擊對象，則即使說話再小心，都還是難  
逃厄運。

選舉本來就是為了要保持大家的和  
平，安全與幸福而設立的，如果選舉言  
論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判罪的話，則選舉就  
只不過成為一個抓人的陷阱而已，這樣  
的選舉有了反而比沒有更為不好。如果我  
被判有罪，會使人感到是民主與法治的  
終結，這樣的判決，將在歷史上留下一  
個永遠永遠難於磨滅的污臭，不但會  
嚴重影響政府的聲譽，而且將給後代子  
孫留下一個最惡劣的榜樣。

如所週知，這次選舉所有候選人  
中，政見發表會的聽眾以我為最多，尤以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在台中的聽眾更達六萬  
之多。如果我被控在政見發表中公然指  
稱國民黨政府為專制暴政，並號召同胞  
填加以打倒推翻，並被判有罪，則在國  
內聽過我演講的人，都會知道我是被冤  
枉的，將因此而對司法失去信心，並且對  
政府失去信心。但是在國外未聽過我演  
講的人，將因不知我是被冤枉的，而認為  
在台灣是以指稱政府為專制暴政並號召  
填加以打倒推翻的言論最受歡迎。如果  
被判無罪，則國內的同胞與國外的人不  
會產生這種想法，所以本案的判決，對  
國家與政府的形像的影響是重大的。

最後，為了國家安全，我再度強調絕

對不可判我有罪。因為檢察官是以指控我  
「顯然，誣毀中華民國政府為一人獨裁，一  
黨專制的極權政府，對全民施行恐怖暴政，  
必須打倒，推翻。以煽惑多數聽眾用非法  
方法顛覆政府」而將我起訴，如果鈞庭判  
我有罪，就等於是鈞庭向全世界公開宣佈：「  
在台灣有人冒著安全的危險，一再公開對數  
百萬民眾宣稱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施行的是  
一人獨裁，一黨專制的極權恐怖暴政，並且  
號召民眾打倒，推翻國民黨政府。」這所  
代表的意義是何等的重大，而且這個人  
還是從小在國民黨政府教育下成長，且在  
31歲就受廣大人民的擁護而當選代表全  
國人民行使政權的國大代表，這樣對整  
個政府聲譽與形象的破壞和損傷將是  
極為重大而無可彌補的。這樣的判決將  
給大陸上的中共一個最有利的宣傳，以  
作為對全世界宣佈主張武力攻台的最  
強有力理由，而他們拿出來的證據，將  
是檢察官的起訴書與鈞庭的判決書。

由於對我作有罪的判決，不但冤  
枉了我，而且更會使國家安全蒙受不利的  
影響，因此要選擇大家安全幸福過日子  
還是要使我全家過難過的日子，也使整個  
國家蒙受重大的危害，這全在鈞庭，以及  
任何能左右鈞庭的人的選擇了，這個選  
擇其實並不須要很高的智慧，而只需要  
一奕奕的理性就足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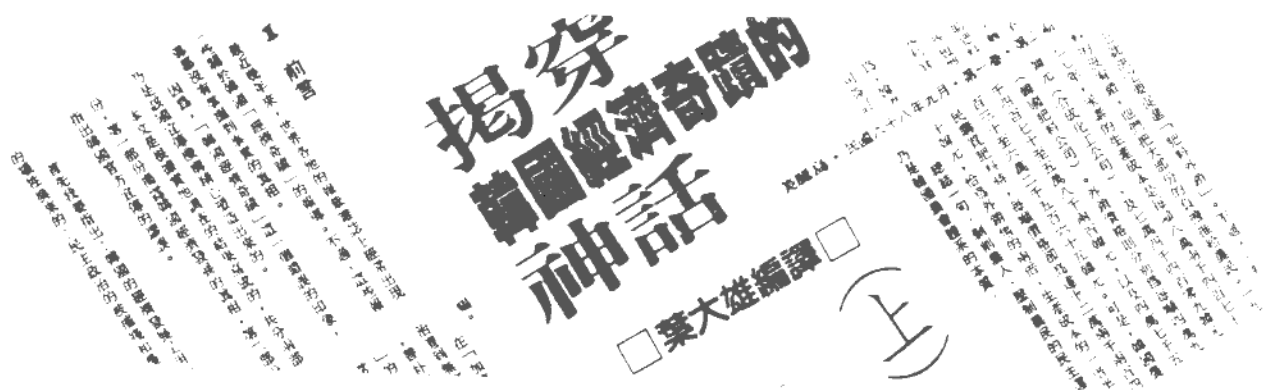
願上天賜我全家，全國安全與幸福！  
願上天賜我同胞以理性與良知。  
願大家前嫌盡釋，和睦相處，合作

無間。

台中地方法院 公鑒  
具狀人 張春男

# 揭穿韓國經濟奇蹟的神話 (下)

· 資料組 ·



**編者案：**本文上篇原由葉大雄編譯，刊登於美麗島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由於之中毫無保留地揭露了南韓經濟成長背後不可告人的一面，因此遭到南韓駐台大使館的抗議。美麗島雜誌社一方面暫停續登下篇，另一方面去函南韓大使館要求南韓政府從速表明對該文的態度。可惜末幾美麗島雜誌即被查禁，致使續篇一直未能面世。

本會終於艱難取得原編譯者所依據的主要資料的原文。現在將應餘部分翻譯出來，以供我們的讀者參攷。（我們決定保留原編譯者所採用的篇名，以表達對原編譯者的支持。）

本文上篇分析了韓國的農村政策。在經濟方面，是大量進口外國農產品以压低國內農產品的價格。逼得大批農民放棄農耕到城市找工作。從1962年到1971年間，有七百萬到七百五十萬人從農村流向都市，（一九七一年南韓總人口是三千四百萬）成為工業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在政治方面，南韓政府通過

農會压制了任何農民自發性的組織。

下篇主要是解剖南韓官才大舉吹噓的「新鄉運動」（即農村建設）。之中指出「新鄉運動」的起因，其實是為了挽救受到國際市場打壓的水泥工業。而所謂的農村建設只不過是強迫農民用他們自己的錢，把房子的茅草屋頂換成瓦頂，把泥土牆換成水泥牆而已。看似好看，但對於農村的根本問題（如糧餉，產量，所得等等）絲毫沒有解決。

雖然全文討論南韓，但是南韓的經濟發展道路和台灣的十分相似，因此在經濟政策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值得作關心台灣的朋友們參攷。



這篇報告主要是探討南韓經濟奇蹟對大多數的人民——工人與農人——的意義。在(上)文中，我盡量詳述了南韓政府這十五年來經濟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如何犧牲農民來達到高速的經濟「成長」。我在这篇(下)文中將更正的評價「新鄉運動」的來源，它在政治上的利用價值，以及它如何應農村的需要而產生，但在農村造成災難。「新鄉」的口號是一回事，它的實際效果可能与口號完全相反；但在決定如何控制農村社會，以及決定經濟方面的優先政策時，當今的南韓政府仍以「新鄉」模式為重心。「新鄉」是人民爭取民主的障礙，因而也註定了它被人民唾棄的命運。

## — 新鄉運動 —

既使韓國政府的基本農業政策是如(上)文所述的那樣作踐農民，「新鄉運動」又是如何產生的呢？追究起來原因有三：

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年代初期世界經濟不景氣，建築業以及它的下游工業因而大受打击。那時最慘最慘的是水泥工業，但近年來此政府大力栽培之福，產量增加了三倍。

二、次要原因是：長期以來農村外流的人口，因受上了經濟不景氣，在大城及其之外的大城里找不到工作，又無家可歸，於是這些数以百萬計的失業人口在大城市及其附近的悲慘的貧民窟裏住下來；社會動蕩不安，許多人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权衡利害之後，南韓政府決定大規模規模的遷徙運動，來掩飾它真正的農業及經濟政策。

三、有了要原則不動地推行既有政策，為了維護「警察國家」及「維新系統」的政權，政府深覺有必要在農村建立效忠它的政治基層，同時也嚴防反抗的產生。

朴正熙總統說：「(新鄉運動)的目的是要消滅城鄉差距，促進現代化的新潮及文化繁榮惠及鄉村；也就是加速農村的成長」。根據「韓國發展處」的報告：「鄉村的茅草屋頂都被淘汰了，家家的牆壁修過，衛生也改善了。農民們挖了井，建立起供水系統，蓋了會議室、倉庫、公共澡堂等的設施。村里和田間的道路都填平、拓寬了。通國家及地方公路的網狀系統建立了，農產品的運輸及農業機械化因而改進。同時，灌溉設施及田堰改良了，可耕地被合併了，這一切都為糧食增產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 水泥

只要細看水泥工業的發展，我們就可以明瞭「新鄉運動」產生的背景。首先，水泥的主要用途是什麼？「水泥工業供給磚、石、瓦和煙囪給住宅建築業；在非住宅建築業方面，水泥廠供給各式各樣的產品，包括建築摩天大樓、道路、橋樑用的加固混凝土，定製的磚以及裝飾用料。」其次，「新鄉運動」開始時韓國的經濟狀況如何？韓大的宋基卓教授在他一九七二年七月發表的文章中分析了運動開始時韓國的經濟危機；他例舉了片片造成不景氣的國際、國內因素；但認為禍首還是六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六十年代末期日趨惡化的「不平衡的結構」。宋教授認為造成不景氣的三個主要因素是：①某些工業的過剩設備及過剩生產；②

商業結構的普遍脆弱；①資金囤積造成的建築業的淡風。這篇文章描述了當時經濟的一般狀況；其中最有意義的是宋毅評論「最不景氣」的工業是「基層工業，如加固鋼、水泥業」。

那麼，我們就來更細看下水泥業的發展吧。韓國滙兌銀行發行的「每月評論」每期細述一個韓國的主要工業的發展；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號的主題是水泥工業。以下是那篇報告的摘錄；讀了之後，我們可以對新鄉運動的真實來源有像水泥一般牢不可破的了解。

「當今政府從一開始就把水泥業看成一個極重要的工業，並在一九六二年起草第五年經建計劃時給以『戰略工業』的地位。那時候全國水泥年產量只有七〇〇〇噸，完全不能滿足未來需求的估計。」

「政府既如此地看待水泥業，廠家於是在第一及第二五年計劃期間迅速擴充現有設備。到一九七〇年為止，不但往年的水泥短缺現象消失了，而且隨著國內建築業活動一般性地減緩，水泥生產過剩了。」

「實際上，水泥的生產量及消耗量在一九七〇年及一九七一年繼續增加，只是年增加率比起前十年來差了很多。可是災情最慘重的还是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水泥的絕對產量比一九七〇年減少了56%，消耗量減少了70%。」

三年蕭條之後，水泥業在一九七三年重見生機；原因是建築活動突然增加，全國的水泥

需求量因而上漲。造成新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一九七二年興起的新鄉運動；小規模的社區建設計劃因而增加。二是同年八月朴正熙總統頒布的『戰亂時期經濟穩定成長法令』，造成了經濟繁榮、建築活動增加的新景象。」

## 政治宣傳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假如你要強迫什麼人買什麼東西，你至少得先假裝出這東西對他有利。毫無疑問地，農民及農業部門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兩年正急需真正的援助及援助。稻米產量正一年快似一年的不能自給自足；一九六九進口米七五五,〇〇〇噸，一九七〇年進口五四一,〇〇〇噸，一九七一年進口一,一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七一年糧食總進口量達到二,七〇〇,〇〇〇噸。從一九六四年以來，農村經濟一年比一年貧困，外流的人口也達到驚人的比率。搬出農村的下場往往是變成城市裏的又一名失業者，住在擁擠的貧民窟裏。市區及社會上常有動亂。反映這時期動盪的例證之一是「宋南暴動」。「宋南」是一個以城外巨型貧民窟；它的一七〇,〇〇〇的住民大部分曾是農民。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貧民窟的居民起來反抗政府，終於被軍隊殘暴地鎮壓下去。這次事件可能是歷次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是它很能反映當時普遍的社會情緒。很多人覺得非變不可，而且要變就得根本改革。農人自然更盼望改革，對政府的農業政策更是怒聲載道。

為了解除危機（也為了過剩的水泥製造廠大市場），政府決定發動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這比起徹底改革它的農業政策自然容易得多；



為了掩飾它改真正動機，以便在宣傳的煙幕後繼續推行雷同的政策。也就是假如不可能作到真正的改革，至少可以製造出改革的假象，把反對者騙住了，你的事業自然也就能順利進行。因此，「新鄉運動」產生了。

大部分農民對這運動改革——反正是覺得光榮。長期以來他們都是被忽視的一群，現在突然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加速農業發展」運動的重心，他們怎能不覺得自傲？但是，沒多久大多數農民就對所謂被政府「關切」的意義不再有任何幻想。運動的宣傳裏依用了大量曖昧的、一般的、動听的詞句來說明「新鄉運動精神」、「消滅城鄉差距」；卻沒有提出具體的政策或計劃來解決任何農業的基本問題或是農民的真正需要。相反地，它只造成了更大的災難。因為沒有具體可行的計劃，運動帶來了各種所謂的籌劃；從而使農民負債；雖然政府有補助，實施這些籌劃得靠更多的金錢、貸款與水泥。負債造成了更多問題；在這之前有些農民還可以自給自足，可是突然間發現需要錢的地方多了；諸如，還債、買材料「改善」住房。這就是運動自開始至今對農民的真正成果；可是政府的宣傳機器才剛開始呢！農民出錢買屋頂的瓦、買鮮艷的牆紙、蓋的房又照起相來好看，而且遠處就看得見，可也就是這些材料讓農民負了債。既然簡單的宣傳騙不了農民，宣傳運動開始朝兩方面發展：一方面是對好農民的「新鄉獎學」，另一方面是對非農業人員的「新鄉改進」。

很顯然地，「新鄉」宣傳最成功的一頁是依非農業人員相信了運動的「偉大成就」。住在城市裏的人、學生、外國人、以及大部分農

民問題脫節的人都容易對這運動的「籌劃」印象良好。而且，根本也沒人可能完全避開運動的宣傳；電視、收音機、報紙都早被政府控制。運動開始後自然整天讚美「新鄉」的成功；每一家電影院都將在放映政府新聞時加映一段介紹「新鄉運動」的短片；公共場所掛起關於「新鄉計劃」的巨型五彩海報；難得看到一本完全沒有讚美「新鄉運動」的文章的雜誌；出了一种「新鄉帽」和「新鄉襪」；每一棟公用建築頂上必然飛揚著「新鄉旗」及國旗；這兩者變成了「國家」的同義字，批評或懷疑「新鄉運動」是犯了大罪；質疑政府的農業政策就是誣蔑新鄉運動，誣蔑新鄉運動就是不愛國的表现；逼迫人們這樣堆砌的系統終於成立了。可是，還是有人批評，但批評的內容常是間接的，批評的聲音既難聽到，音量也常被政府震耳的宣傳蓋下去。宣傳製造出「模範村」，還有參觀模範村的旅遊事業。據政府統計，從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六年間，有一〇、三五四外國旅客從七十四個不同國家去參觀了農村的「新鄉計劃」；其中半數以上是從亞洲國家去的。「有人說泰國政府至今已派遣六十三個官員，其中包括副部長及廳長們，去韓國參觀學習，以便把「新鄉」原動力散播到泰國去。」

一想到新鄉運動被推廣到其他國家去，英依人不寒而慄。泰國農民與韓國農民當然沒有接觸，也無法知道運動的真實意義。村裏的擴音器、收音機、學校的擴音器到處都播放「新鄉之歌」；這首歌據說是朴正熙總統自己編的；每個學生都學會唱。

對農民的宣傳（或招攬）可是大異其趣；

告訴農民的一套是：「假如你窮，那是你自己的錯」。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服農民，使農民相信農村的貧窮是因在農人的懶惰及缺乏進取精神，要農民不要把現況怪罪於政府，如讓農民負起改良現況的全責。最近中、小學的教科書裏已出現類似西牙「天助自助者」的格言；正如朴統統所說：「居民的自我認知及反想改善生活的堅強意志，加上自立的精神，村子之間的團結合作，構成了復興農業社的主要動力。」

對農民的「新鄉運動」的三個重兵是：①合作，②自立，③勤勞。這三個都不是什麼坏事，關鍵在於政府如何定義它們。「合作」指的是與「新鄉」領導人及政府合作，別惹麻煩；「自立」指的是別指望政府幫你解決問題，自己解決它；「勤勞」的意思是每分每秒都辛勤工作，你就一定會成功。

由於政府遠遠低估了農民對工業化的不情願的真正貢獻，政府敢說：「我們不欠你（農民）什麼。」，所以，「別對我們抱怨你的貧窮」；然後政府裝出要在工業化之後發展農業（到那時候大多數農人早被迫放棄耕地，去工廠作工了）。最絕的是，這種宣傳（或哲學）居然可以與大眾傳播中的「新鄉宣傳」共存，而大眾式的「新鄉宣傳」製造的正是完全相反政府在農村扮演的角色。政府一方面對農人說：「自己想辦法！」，一方面向大眾，甚至向全世界，大聲疾呼：「看我們對農民的貢獻多大！」

## 維新系統

政府很自傲地把維新系統和新鄉運動連在一起，這兩者似乎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政府說「新鄉精神」孕育了「維新系統」制度，「新鄉運動」是實施「維新系統」的具體工具，還說「新鄉運動」給鄉村帶來了「民主程序」。也就是，新鄉運動是把「維新系統」散播到鄉下的工具，從而建立廣泛地效忠政權的政治基礎。每個村裏總有一小撮人受「新鄉運動」之惠；難怪這些人會以新鄉領導人為中心，形成一個推行（或加固）運動和擁護「維新系統」的小圈。這種人各地都有，集起來就是一個全國的情報網，專門監視和防止農民對政府農業政策的抗拒。這個組織既可算作新鄉運動的次要作用（僅次於水泥與政治宣傳），又可算作推行運動的手段。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說是村裏最富的農人之一被激發為新鄉領導；富農可在經濟、政治兩方面收「新鄉運動」之惠。假如他已經有些錢，那麼運動的建屋籌劃可能對他百利無一害。他也可以用他的地位來追求政治上的利益；一旦登上「新鄉領導」，他可以去上政府開辦訓練班。訓練班名義上要訓練出更好的領導，實際上氣氛非常軍事化，作用在於灌輸「新鄉精神」給這些領導人，並培養對「維新系統」制度的忠心。「有一個訓練中心在一七七二年成立，用以教育領導，重點則是紀律及法論。」這種訓練助長對運動的積極者一說統一的歷史，並且教人如何推行運動，方法中自然也包括「新鄉哲學」。



## 新鄉運動的其他方面

運動的另一好處是建立起一個結構，以後政府下達任何政策都方便得多，尤其當政府的政策不受農民歡迎的時候這個結構就越形重要。因在「反抗新鄉運動」就是「與全國作對」，就是「不愛國」。經由這條渠道，政府得以實行了很多其它的「計劃」，諸如「增加收入」，「增產」等。

很多其它的計劃假「新鄉運動」之名而得以推行；運動推廣到城市裏，試圖建立所謂的「工廠新鄉運動」的勞資組織。我無意在此介紹運動的每一方面；我只想揭露運動的平反反它的主要措施對農民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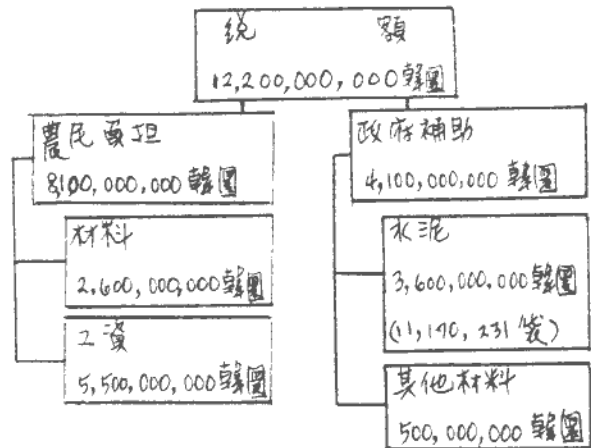
## 社區建設及房屋改建計劃

政府聲稱的新鄉運動的成就裏，最主要的要算是所謂的「社區建設」及「房屋改建」。實際的情形則是，這兩者在宣傳及增加水泥銷售量是些比的成功，但帶給農民的只是苦難。不管他們願意與否，農民都得加入這個計劃，而他們得到的是什麼？對大多數農民來說，只是債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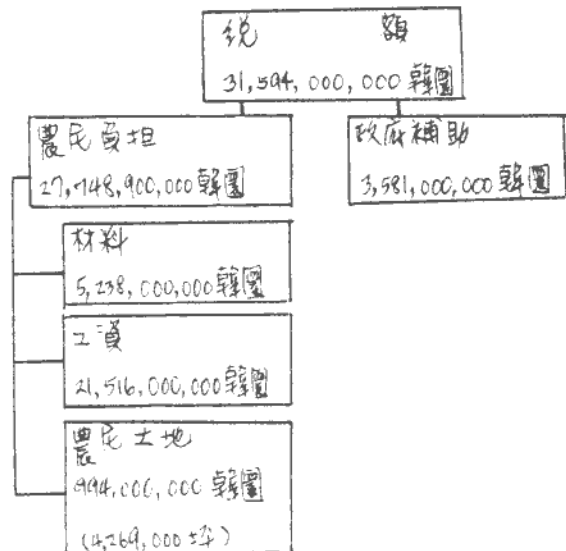
新鄉宣傳宣稱下列各項是運動的偉大成就：磨整的瓦頂代替了茅草屋頂，新建的水井，供水設備，會議室，倉庫，公共澡堂，以及拓寬、平整了的道路。這些「成就」有三方面的共同性：（1）都需要大量水泥，（2）假上鏡頭，（3）都不解決農業的基本問題。更加

上完全是政府官員判定的「改良農村計劃」，完全沒有問過農民的意見，更別提滿足農村的需要。實施的時候，都是政府強制執行，既不經農民同意，也不鼓勵農民發揮創造力，可又大部分是農民出的錢。政府洋洋得意的說，運動近尾聲時核算的各種「計劃」的總值已遠遠超過政府的投資；這些錢從那裏來的呢？是不是如政府所說，是農民熱心運動的表現呢？下面的兩個圖表可以充分說明事情的真相。

- 一九七一



- 一九七二



这些统计数字虽是政府公佈的，倒也頗使人深省；只有一處需要澄清，那就是農民花的材料費仍然估計得偏低。根據同一政府消息來源，一九七二年農民花在買水泥及加固鋼的材料費已有9,484,000,000韓圓，〔註：480韓圓=1美元〕，比圖表所列那年的政府補助及農民總支出加起來的錢還多。政府資料裏還顯示，一九七二年一棟十八坪〔註：3000坪=1公頃〕之家花在房項改建上的錢是32,400韓圓；其中包括政府貸款10,000元，補助5,000元，農民自己得出17,400元。可是實際支出可能加倍於政府估計；也就是說，農民的支出可能三倍於政府估計。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一九七二年政府估價農民所捐（或征收）的土地時：政府估價是每坪的土地值233韓圓，低到可笑的地步。

很不幸的是，一九七三年的詳細統計數字沒有公佈（那一年也就是「全國34,665」社區高潮火朝天地幹運動」的一年），也看不到那以後幾年的統計。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到類似的情形一定還存在；只要看到政府公佈的美妙數字時心存警惕，總能從字裏行間知道一些真相。

運動的涵義，對農民來說，就是債務；這當然不是任何統計數字或宣傳會透露的，因而更難以估計。可是運動的成果的確只是令農民欠一屁股的債。

振南大學的張伯恩教授是這樣討論「房屋改建計劃」的：

“學洋唱外，鄙視本國文化的領導，無疑地

是在思想上得了文化軟骨病。茅草項的成就是我們以農本位的文化遺產中最自然、最不做外文的。只要改變一下我國以稻米為主的農業情形，就不難了解為什麼稻稈是最常見的蓋屋頂的材料；何況我國四季溫差很大，茅草項能越冬又冬暖夏涼。”  
可是茅草項不分政府摩登的要求，也不上鏡頭。

政府宣傳的動機已讓人噁心，使用的手段更是不堪；一切都是自上而下，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下級官員只能盡力準時完成指標。有了服從上級，有了準時完成任務，很多計劃都連夜趕工完成，但也因此粗制濫造，「成果」沒多久就東倒西歪，破破爛爛。有一次一位高級官員要到某村視察，在他到達之前那個村子總算把下水道蓋好了；建得既急促，又沒有人懂得應該怎麼建，只要好看，讓那位官員龍心大悅就成了。可是沒過幾個月，新建的下水道就完全垮了，到那污泥氾濫情形比「計劃」實施之前更糟。另外在昆山的南道發生過一件事：當地農民拒絕在政府訂的期限之前把房屋改建好，當地的官員就地一4坪的未成熟的稻米全砍光。

一九七九年三月份東莞日報中有過這樣一篇長文，報導農業的每況愈下：

“被迫參加社區改良計劃的農家，每十家就有八家除了欠政府的錢（因房貸款），每家還欠了500,000到1,500,000韓圓的債。靠近公路的農家更倒運；他們的房子往東建得不能如他們所願的全北朝南，如果公路從他們的北面經過，房子就得蓋成面向北，面

向公路。有些公路旁的房，兩年來屋頂才翻修過，現在卻得把整棟房拆掉重建。同時，城裏來的炒地皮的人開始投資於「計劃」，商人、官員紛紛搬進了農民新蓋的房；就以中州北道的吳村為例，那裏十三座改建的房裏只有兩家農家。

一位農民說：“假如某个村被指定建成「模範村」而又通過審核的話，那村的最長官就可以拿到一個萬韓圓的獎金，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死命地要我們改建屋頂。在一個「模範村」裏，即依豬圈的牆和圍牆都得重新建過，如果長官想要拿到獎金的話。”

根據一位農夫的描述，他的村，因為位於風景絕佳的某公路旁邊，而遭到如下所述的待遇：

“總統於一九七九年年底特令，指定我村在「社區發展」區域。每家都得拆掉，改建成廿五坪的新屋。政府補助每家500,000韓圓的拆遷費及2,800,000韓圓的二十年貸款。新房的式樣是規定的，而且必須在指定期間完成；這是區長的命令。要把房蓋得符合他們的規定，我們得花五六百萬韓圓；大部分的房主那有這麼多錢？沒辦法，只好去向城裏的高利貸借錢，利息高得嚇人。還有更多的人，無論如何也湊不出這麼多錢，只好用500,000韓圓的拆遷費搬走了；消息不知怎麼傳開了，城裏的一些有錢人來村裏把這些遷空的房又買了下來。……我本來想要在這件事提出抗議，可是听说如果我這麼作，可能會因為觸犯刑法第九條而被關進監牢；總統的「最高指示」是不容人有異議的。”

## 增產

政府的「增產」政策有時被看作「新鄉運動」的一部分，有時被當成一個與運動無關的政策。可是，一方面因為「增產」宣傳和「新鄉」宣傳渾然一體，一方面因為政府在鄉間散播「增產」政策的手法與「新鄉」政策類似（也就是說，兩者都充滿了「新鄉精神」），所以把「增產」政策看作新鄉運動的一部分也沒錯。

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稻米產量逐年下降，需求量逐年上升；到了一九七一年，情況糟到不能更糟，進口稻米達到1,100,000噸；負責經濟計劃的官員原本對物性農業發展與工業，却突然增到了農業人口外流的惡果。本來稻米生產度可以自給自足，現在却需要進口一年比一年多的米，一般民眾因而非常不滿；可是政府最大的顧慮却是一旦稻米供求不均，米價上漲，就會影響到作為大出口商命脈的廉價勞工政策。如果國際糧價不漲，那麼韓國政府只要每年購進大批稻米就足以壓低國內米價，偏於一九七三、七四年發生了石油危機，使得這套「米」以自重（輕？）的政策也行不通了。隨著石油禁運及油價上漲，舶來米的最大來源——美國的糧食公司——也相應地提高了糧價。一九七四年一年之內，穀價漲了兩倍。韓國政府因此不得不另求解決問題的仙丹妙藥，以便繼續壓低米價，同時還增加稻米生產量。政府於一九七二年推出了「稻米雙價系統」，又在「一九七三、七四年開始強迫農民大規模種植新改良成的東日「高產」米。對政府來說，東日米是成功的，他們也年復一年地強迫農民

种这种米。对農人来说，东日米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我们只要看「增產」运动对農民的意义，就可以看出一件事来，越来越多的農民覺悟到粮食和工資之間的關係，因而不願增產，作政府压榨廉價勞工的工具。他們不肯增產，政府就逼他們增產，依用的手段開始時包括來自大眾傳播及全國的黨鄉宣傳機器的大壓力；「增產」及東日米的種植被當作政府和農民攜手並進的偉大的、艱鉅的任務。繼之而來的則是政府官員（包括AC官員和鄉鎮領導）施的壓力；他們的上级規定了他們那一區至少有多少農田必須種上東日米。如果全區都種了這種「高產」米，那一區的官員有獎，如果達不到指標，負責的辦事人員會被撤職。對農民哄騙不成的話，辦事人員就會用強力執行，最常見的情形是，如果有農民敢於抗命，甚至大胆到種了日班米的話，辦事人員就會去把他的米苗砍光。“就以華中村為例，那裡有三個農民在他們七百五十畝的田地裡種了好吃的日班米，而沒種「高產」的東日米，村長和十個辦事人員於是帶了鐮刀來，把農民種的米苗連根拔起、割斷或踐踏在地。”

上面既然這麼留風行的逼農民種統油米，稍有良心的地方官員既不願壓迫農民，又不敢得罪上级，於是不得不在統計數字上作手脚、捏造假報告。關於昆吾道的報告有這麼一段，“當地政府官員自己承認，很多地方以下的單位在報告中作假，時常把耕地面積報成實際的兩倍大。”

政府算準了時機，在一九七二年推出「雙

糧餉政策」，又在一九七三年開始強迫農民種東日米。消費者不喜歡東日米的味道，所以東日米的市價比日班米低。農民因此陷入一丁米價被人壓低、米產量却不斷提高的複雜系統。也就這個系統之禍，市面上出現兩種等級的米：一種叫作「活命米」（或「平價米」：），是給勞工吃的；一種叫做「好米」，是給買得起的人吃的。

農人一旦開始種「東日」、「維新」或「奴僕」米，就需要大量的肥料和農藥。這是後發新品種時就放廢到的，而且是造成「高產」的必要因素。大量使用肥料兩三年後，這塊地就再也不能種日班米了，土地也貧乏了。使農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這個因素功不可滅。而且，為了購買大量的化學藥品，農民在春秋兩季不得不向高利貸借更多的錢，農業生產的成本也更高了。可是對政府所倚賴的跨國公司，諸如海灣石油公司和道氏化學公司來說，還有什麼比化學藥品需求大量增加更好的消息呢？

大量使用、愈來愈倚賴化學藥品的後果，想來最令人害怕的，莫過於假農藥之牛、殺害農民這一事實。東日和其他各種「高產」米是在實驗室裏育種成功的；他們對病虫害的抵抗力幾乎等於零。農民一旦被逼開始種這些品種，就不得不使用大量殺虫劑、除草劑、殺菌劑；唯有這樣，作物才能存活。使用這些藥品的結果是螺旋式的反噬的開始：使用的重藥殺死了益虫，也提高了某些害虫對農藥的抵抗力，於是就得用更重的藥……螺旋式高的反噬一旦開始，對害虫之戰只能愈來愈昂貴，而不能由一、兩個農民因產健康的願望而停止使用農

药；如果停止使用农药，今年的收成也就没指望了。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间，农药用量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一九七四年因为政府大量种植水稻，农药用量突然增加许多。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两年间，农药用量增加了331%。这难以置信的增加是怎么造成的呢？除草剂用量增加了360%，杀菌剂增加了800%。以一九六六年为准，锐耕地面积是2,248,000公顷，所以每英畝平均用药70公斤；韩国因而远超过其他国家，成居在世界上每畝用农药最多的国家。连一向被认为用农药很凶的日本，用药量每畝平均只有10.8公斤，美国也算是勤于施农药的国家，用药量每畝平均1.5公斤而已。

用农药就像吸毒一样，没有回头路可走：一旦开始用，就会越来越倚赖它。一九七七年的用药量比起前一年来稍有减少，但一九七八年的用药量又增加了24%，病虫害也随着药量的增加而更严重了。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七的八、九年间，遭到病虫害损害的耕地面积增加了2,560%，同期间有昆虫害的田地面积增加了1,750%。

很多農人在噴洒化學藥品時，或在噴洒之後，死於化學中毒；但是政府對這類新聞一概封鎖，只有少數漏網之魚得以見報。農民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他們不知道農藥的危險性，也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安全的使用方法；而且，由於農藥中毒的新聞常被封鎖，農民對這方面毫無警覺。農藥的藥品是英文字，包裝上又沒有使用方法的說明，討論農藥對人體的

害處又是被禁止的，農民遂把噴洒農藥看成像雞一樣稀鬆平常的工作，許多農民因而中毒、死之。

一九七八年三月，淡陽河拉南道的郭聖遺家有八人因汞中毒而癱瘓，起因是農藥使用過量。政府沒能封鎖住這件新聞，得以在民間激起熱烈的討論。政府馬上想法轉移民眾對郭家事件的注意：四月十日衛生部宣佈中央保健所已經調查，判定郭姓人家「不是因作物汞量過高而中毒」。新民主黨代表在國會問會時要求政府進一步調查此事，可是政府說這件事已經結束了；新民主黨代表一怒之下全體連席抗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大學調查組調查了全國一七八區，發現郭家稻田裏的汞含量高達1.225 PPM，遠超過全國平均的0.141 PPM。

韓國時報時有這麼一篇關於郭家的社評：

“除此之外，蜜蜂、蝴蝶的數目減少到驚人的地步；梨子、蘋果、桃子園裡修遭化學藥品之殃。同時，有些河裏的魚池也大受影響。更糟糕的是，我們每天都在吃被毒藥污染的芝麻、花生、小米和綠豆。”

中央保健所在三月初的報告說，全國一八區糧食地樣的化學分析顯示出DDT、鉛、銅和汞的存在。

一九七七年昆南保健所作了稻米和蔬菜的普查，發現其中有危險性的重金屬含量高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鎘含量就高達1.6 PPM；三年之久的金保地區普查時鎘含量才只有0.0

95 PPM。日本对農產品鎊含量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得超过1.0 PPM，美国的標準是不许超过0.5 PPM。韩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规定。

到一九七八年时，韩国政府除了继续迫种「高產」米，又推出一个叫作「奴僕」的新品种，逼農民大量种植。「奴僕」米一敗塗地；它雖然倚賴大量農葯、肥料的作用，对病虫害仍毫無抵抗力，所以种「奴僕」米的田大部分都不見作物的成長，農夫不得不在七、八月間把作物砍掉。到九月截止「奴僕」米的受災區已達到154,272 CHUN G BO，也就是全國稻田面積的12%以上。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四日，政府報告中顯示的138,200百萬韓圓的損失中，得到政府賠償的只不過19.2%。

「奴僕」米不但給農人帶來很大的災難，它也預示了所謂的「綠色革命」的終將失敗，以及「增產」極限的到達。一九七八年的作物收成比一九七七年少3150萬50K，一九七九年中又有几个新品种被大力推廣，雖然事實顯示出「增產」政策的失敗已不遠了。一九七九年二月政府宣佈鼓勵十种新品种的稻米在2,790,000,000年的土地上种植。

基於一九七八年种「奴僕」米失敗的教訓，第二年農民越來越反抗种植新品种。四月份的朝鮮日報是這樣報導的：“自從「奴僕」之災後，農民对种新品种的抗拒很大。李果知昆果的辦事人員挨戶搜查農家，看有没有藏日班米种籽的；假如找到的話，既使那家的農人不在，种籽還是會被沒收。”政府於五月中宣佈

將從美国進口米三百三十万50K，十二月時宣佈將於一九八〇年進口米510,000噸；這兩次公告不啻於宣布了「綠色革命」的失敗，也等於宣佈了政府將採用老法子，進口外國米來压迫本國的農業經濟。雖然一旦承認錯誤政府就要顏面掃地，事實仍然太過明顯：漢城的经济新聞的社論把這事說得很清楚：“由於奴僕米的失敗以及農人的拒种新品种，「增產」政策已陷入絕境。”

## 增加收入

自一九七三年起，「增加收入」計劃就成了運動的一部分。就在開始压低穀價政策的同時，政府假裝開始了一個提高農家收入運動。政府宣稱「增產」及「雙糧價」政策是政府对「增加收入」的貢獻，實際上，這兩個政策同時施行的結果是，農民越來越不能把稻米生產當作主要的生計。因此，新鄉運動一開始就著重介紹何謂收入，從而使農民不把稻米生產看作唯一收入的來源。其次要使農民的非農業收入在一九九一年以前增加到總收入的一半。換言之，新鄉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作滾動潤滑油，使原已臣服的農業經濟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更快速、更完整的融入工業、外銷經濟中。

政府發動這些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製造宣傳，混淆真相。很多「增加收入」方案的施行結果是使農民受債更深。既使當方案順利地增加了農人的現金收入時，最大的受益人還是那些大財團，因為在這些年他們的產品到達不了荒蕪僻壤，現在成了他們的新市場。當政府於一九七八年假「安定」（「压低」）物價



之名，進口了大批「現金作物」和肉類，當初被騙或被迫種這些作物，養這種家畜的農人可吃了大虧。養蠶是最被廣泛宣傳「增加收入」計劃之一，實際上也只是外銷方案的一部分。被迫養蠶的480,000農家遭受了空前的慘劇；以及發覺因在「增產」運動中大量用農藥而被毒死等種之巨大災難，政府却毫不負責，只是從此逐漸少在新鄉宣傳中听到養蠶這一項。即依此之計，養蠶的農家已經因在種桑日米，不得不增加農藥的用量，因而殺死了很多蠶，農家損失已經很大了。

「新鄉工廠」的原來構想是在農村設立地方所擁有的小工廠，用當地農、漁產品作原料，僱用農民做兼職工；用意在於增加農家收入，充分利用冬天的「農閒季節」。第一批「新鄉工廠」無一例外的都一敗塗地，敗到只能充當倉庫或厩屋的地步。一時之間新鄉工廠的宣傳銷聲匿跡，可是最近又捲土重來；新工廠可跟原來的大異庭徑。韓國發展處的「對政策發展的建议」中說：“政府應該鼓勵中、大型企業機構到鄉村設廠，以增加農村收入；這些企業機構可以是現有的，與政府、與其他大公司、與外銷廠商關係良好的大財團的分公司或子公司。”新發展雖然還用的是「新鄉工廠」的名義，與原先已大不相同；讓「中、大型企業機構」和「外銷公司」在鄉村設廠，顯然不是為了造福農民，而是有利於企業機構。漢城和其他大城市已越來越不好控制，勞工運動日趨蓬勃，工資提高，社會不安定，勞工又短缺。把賺錢的企業搬到鄉間是一舉兩得：破壞勞工運動的基礎，發掘更多廉價勞工的來源，不用逼迫農人遷徙就可以令他們「轉業」，而且最終可以恢復整個南韓變成一個98,807平方英里

的新加坡。

政府日益热衷于工業「疏散政策」；昆國韓華工業公司就以成立新鄉工廠的名義於一九七八年搬到鄉下去了。這工廠僱用了160名工人，進口生皮，經由外銷商出口所有的產品。一九七九年四月政府又批准了十一家成立新鄉工廠，使得全國新鄉工廠的總數達到54家。政府對這54家公司每一家都給以100,000,000韓圓的貸款，16%的利息，分五年付清，還可以緩付三年。新工廠中包括依口刀先製造廠；他們的廠佔地54坪，而且是與美商威爾堅遜(WILKINS ON)，合資的工廠；這是一個以賺錢為目的的投資，顯然完全不考慮農民的利益。工商部長蔡德求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舉行的新鄉領袖大會上，要求各領導人支持新鄉工廠運動，目的是在一九七九年一年之內達到外銷額15,500,000,000美元的目标。

中部大學的戴昆文教授這樣形容新鄉工廠運動：

“新鄉運動的改建計劃改善了社區與鄉間道路，汽車、卡車從此可以開到幾乎全國各鄉村。因此農村在產品的需求方面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在以前貨物都是人手提或背到農村來賣的，可是現在幾乎為各村都是靠卡車來運輸貨物了；這就是新鄉運動的成果。在這運動裏農民被逼得花了很多錢；他們的生活因而更貧困了。”

正如果政府官員所說，新鄉運動的目的是要改變農民思想，使農民不再怠惰遲緩；這目

的也終於達到了。

## 結語

新鄉運動的過程，對我們沒有任何廢物利用的價值；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反農民、反民主的。農業系統的其他方面也許只需稍加改進及農場民主作風，新鄉運動却已病入膏肓，我們只能把它澈底揚棄，它的本質是作為「維新系統」的制裁系統在政、經、宣傳三方面的工具，它是假提高生活水準之名，行鞏固鄉村統治之實的，精打細算出來的專權奪利的手段。

這篇報告的目的是想讓讀者了解韓國民眾的心聲，也想盡可能地揭露所謂的南韓經濟奇蹟的神話。南韓民眾的心聲是要求民主的心聲，即依暫時被政府時刻不停的宣傳機器及國內外新聞界聯手掩蓋下去，他們的聲音最終是壓不住的。長期以來農民都是最被壓迫、最沒有民主權利的一群，正因為如此，政府想出了新鄉運動來掩蓋真相，可是人民的意願是掩蓋不了的。人民要求民主，想要阻擋的人必將滅之。當人民能夠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時，才是真正的民主，而這樣的要求實在一點也不過分；拒絕這個要求才是滅絕了人性。對農民來說，重新奪回民主是爭回他們失去的人類尊嚴一樣重要。有這個覺悟之後，農民聲言：“我們是依民族、國家富強的真正主人，所以忽視、剝削我們就是反民族、反國家。農民運動的目的就在於奪回我們的人性尊嚴，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 捐款報告

一月份：

姓名	州	數目	姓名	州	數目
Y	MA	\$ 20.-	L	IL	\$ 20.-
L	MI	20.-	H	CT	10.-
L	CA	40.-	H	MN	15.-
C	IL	50.-	N	MA	15.-
L	IL	20.-	L	PA	10.-
X	AZ	20.-	S	-	100.-
W	MN	25.-	C	CA	100.-

二月份：

C	IL	\$ 100.-	C	IL	\$ 20.-
C	NY	21.-	Y	IL	20.-
C	IA	20.-	C	IL	50.-
L	WA	50.-	W	NY	50.-
Y	IN	25.-	T	IL	100.-
C	TN	30.-	N	MA	15.-
L	TN	60.-			

三月份：

L	IL	\$ 250.-	L	NJ	\$ 30.-
L	TX	150.-	H	MN	30.-
K	TX	40.-	H	IN	10.-
C	CA	50.-	T	NY	100.-
X	AZ	20.-	Y	MO	200.-
H	IL	20.-	C	MO	20.-
H	WA	100.-	H	TN	20.-
K	OH	60.-	K	TX	30.-
L	CA	20.-	C	IL	90.-
X	MI	40.-	L	CA	20.-
C	IL	40.-	W	NY	25.-
C	IL	60.-	L	IL	20.-
C	MI	10.-	Y	MO	20.-
L	NY	60.-	X	MI	20.-
X	AZ	20.-	L	AZ	30.-
L	MA	20.-	L	IL	30.-
W	IL	20.-	C	IL	250.-
H	IA	15.-	C	IL	50.-
C	CA	20.-	C	NC	60.-
Y	CA	20.-			

# 到民主之路

編按：此為黃煌雄的競選傳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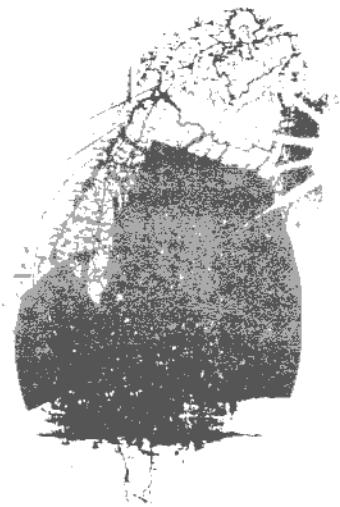


第一區  
宜蘭縣  
台北縣  
基隆市

立法  
委員  
候選人

## 4

### 黃煌雄



#### ■三項特別主張：

- 一、確認祖先價值及三十多年來黨外民主運動的歷史意義
- 二、為促進全民實質團結，加強四海同心的政治號召，鄭重籲請國家元首，依據憲法所賦予的職權對高雄事件受刑人行使特赦
- 三、修改「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違背民主思潮的部份規定

#### ■三大綱領：

##### 一、政治更加民主

1. 全面合理調整中央政治體制。
2. 縮短中央民意代表區域選出得票。
3. 開放黨禁，尊重言論出版自由。
4. 開放黨禁，尊重言論出版自由。
5. 公佈省縣自治規則及制定直轄市自治法，使省市長民選。
6. 在財政和人事上，賦予地方政府應有的較大自主權力。
7. 全面合理調整地方行政區域。
8. 嚴格劃分國家、政府、政黨三者之關係。
9. 公務人員中立化。
10. 軍隊國家化。
11. 解散戒嚴令。
12. 法官超黨派。
13. 偵查期間，被告得選任辯護人。
14. 政策擬定先經公開討論。
15. 為貫徹黨政精神，憲法列為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目。

##### 二、經濟更加平等

1. 廢止田賦。取消所有妨礙農民自由選擇作物及土地利用的法規及人為障礙。
2. 提高稻作保證收購價格，無限制收購，以確保糧食。
3. 增設農林部，統籌全國農林事宜。
4. 保障勞工自由組織工會權及集體爭議權。
5. 制定合乎先進國家水平，保障勞工利益的

勞動基準法。

6. 增設勞工部，統籌全國勞工事宜。
7. 實行賦稅改革，刷新稅務行政，以簡化中飽及防止逃漏，作為減輕人民稅負的基礎。
8. 促使稅務法規明確、清楚、合理，使人民有免於稅務恐懼之自由。
9. 逐步降低或取消貨物稅及財政目的之關稅等間接稅。
10. 大幅提高個人綜合所得稅的起征點、免稅額、寬減額及扣除額，比照物價指數變動，以減輕低所得者負擔。
11. 確實執行國父平均地權政策，以照價抽稅及照價收買，解決國宅建地問題。
12. 廢除所有阻礙經濟自由運作的條約，及保護壟斷特權的獎勵，以提高國家資源經濟效率。
13. 在公平原則下，尊重市場機能，促進商業及貿易自由化。
14. 在合乎憲法原則下，公營及專營事業開放民營競爭。
15. 金融業務開放民營，消除特權貸款，使全民同享金融利益。
16. 利率依市場自由調整，以保護小額存款人利益。

##### 三、社會更加福利

1. 增列社會福利預算，以示推行社會福利決心。
2. 廣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
3. 運用勞保收入，實施勞工養老健康保險。
4. 實施農民健康保險，並進而實施全民健康與失業保險。
5. 強化醫療系統，充實各鄉鎮（市區）衛生所的醫療設備。
6. 制定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交易法，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7. 制定公老法，以維護人民健康及生活環境。
8. 縮短兵役期間，提高士兵待遇。
9. 實施國民法律教育，國中開設與民衆有關的通俗法律課程。
10. 國中以上設立職業熱能學校，以增加人民生活技能。

■生 齡：36歲  
■籍 貫：台灣宜蘭  
■學 歷：冬山應安國小  
省立宜中初中  
省立宜中高中  
台大政治系學士  
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經 歷：台北市私立中興中學教員  
中央研究院人事室科員  
台大研究生協會第一屆主席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秘書  
大同工學院講師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講師  
■著 作：論戰國時代的合縱與連橫  
革命家一神澤水  
被壓迫者的怒吼  
非暴力的鬥爭  
國民黨往何處去  
到民主之路

#### 賜教處：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24號  
電話：(039)565553、565554  
台北縣板橋市大東街17號之7  
電話：(02)9442138、9442380  
基隆市愛二路50巷5號  
電話：(032)253689

# 當前民主運動的歷史任務

本文轉載自黃煌雄  
先生近著「到民主之路」  
一書。本書已被查禁。

## 一、「風雨飄搖」

在中國近代史上，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居於首功的國民黨，在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不僅慘遭袁世凱通令解散，而袁氏還稱更稱國民黨為「亂黨」，國民黨黨員為「暴民」；同時，隨着北洋軍隊源源進入南方，袁氏體系更實質佔有整個中國之際，國民黨竟於創建民國後不久，在國內卻「黨名無存，黨務亦無可進行」。這時已將近有廿年黨齡的國民黨，正如「當時屹然獨存」的「海外黨部」，其中的美洲支部，在修改其「規約草案理由書」所形容的：「國民黨之在於今日，其為風雨飄搖之時乎？」

十二年後，受日本統治已達約卅年的臺灣同胞，在臺灣近代先輩的領導下，經過五年以上非武裝反抗運動的體驗，在慶祝當時被壓迫的臺灣同胞唯一的歌者——臺灣民報，創刊五週年的特刊號上，也以微弱的話氣，自問自慰地說：「三十年來風雨飄搖的臺灣人，居然也會做得一件差強人意的事業嗎？」

## 二、共同追求

民國十三年，中華民國雖已成立十二年，但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卻尚偏處在中國南方的一個角落，不但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在國際上受到各國政府的承認，即在國內的政治舞臺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整個政局仍以北洋政府為重心，北洋政府儘管一再更迭，但國民黨卻只能困處在南方，而在其活動的範圍內，甚至仍有充滿敵意的軍閥盤踞着。不過，這時的國民黨，在現實政治上，雖沒有足夠的發言權，卻有更受到確認的偉大領導者孫中山先生，和他手創的指導原理——三民主義，以及經過改組後非常具有生氣活力的黨的組織，和武裝有革命精神的軍隊。由於孫中山先生的救國思想——三民主義的宣傳，已深入人心，且已獲得國內廣大青年、學生、工人、農民的熱烈贊同與支持，當國民黨組成國民政府，並在民國十五年七月，以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正式誓師北伐後，就在不到二年半的快速時間內，將自袁世凱逝世以後，十多年來，一直陷於分崩離析、割據局面的中國，重新引導走上實質統一之路。

當中國國民黨正在中國大陸的廣大舞臺上，向全世界展現其奮鬥的光芒時，在臺灣海峽的另外一邊，作為日本國民的臺灣同胞，也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以非武裝方式，向全世界展現其反抗的意志。從文化協會推行的啟蒙運動，和經由文化協會深根發展的大眾運動，都客觀地指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戮力以求的目標，可以內涵在臺灣民眾黨，到民國十八年之際，當其已成為臺灣抗日運動的主流時，所提出的三句簡潔、有力、而又博大的口號之中，此即「獲得政治的自由，確立社會的平等，實現經濟的解放」。同時，由於臺灣近代民族運動蘊涵有濃厚的「民族」氣質，加上這個運動的推動者，又毫無忌憚地公開期待中國近代國民運動能完成其革命任務；這種情況，遂使當時身處臺灣海峽兩邊的中華民族同胞，幾乎在同一歷史軌道上，作共同的歷史追求。

### 三、共同挑戰

六十多年前「風雨飄搖」的「國民黨」，和五十多年前「風雨飄搖」的「臺灣人」，在大約半個世紀前，以同一民族不同國民的身份，分別在臺灣海峽兩邊，以同樣感人的精神，在各自的政治舞臺上，為共同的歷史追求，而心繫一致地奮鬥。這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動人心魄而又光輝的一頁。

三十多年前，這兩股形式不同，實質相同的歷史潮流，因中國現代史上最嚴酷的對外戰爭，而實質地結合起來；但這兩股已告結合的潮流，很快地又因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變局，而遷移到臺灣地區。所以今天集結在臺灣地區的主要政治系統，如果探本溯源，實是半個世紀前，因特殊的歷史契合，而培養出特殊的民族感情的中國近代國民運動和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兩大系統。

這兩大系統，現正面臨共同的挑戰，面臨中共突破長期的孤立封鎖，而崛起於國際政治舞臺之後，經由外交、經濟及體育諸方式，想窒息我們在國際社會生存活動的共同壓力。由於二次戰後的國際戰略情勢，到今天已有根本性的轉變，這種壓力不僅愈來愈真實，且愈來愈吃緊，因此，今天集結在臺灣地區的所有同胞，也正如他們的祖先所曾經歷的一樣，正面臨「風雨飄搖」命運的挑戰。

不過，這兩大系統，今天並不像他們的祖先，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國民，作共同的追求；而是在相同的地方，以相同國民的身份，要共同向全世界證明，他們不僅具有生存下去的能力與條件，更有承繼廿世紀初以來中華民族祖先共同追求的決心與意志。

### 四、兩大發展

由這兩大系統組成的既成體系，在民國六十年代以前，因二次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和臺灣海峽兩邊的政治情勢，均未有重大的變化，所以多年來，在臺灣地區，儘管也曾發生過小小的連漪或波瀾，但從全局而言，始終未碰到類似沒有反應即不足以圖存的重大衝擊與震撼。

但這種情況，到民國六十年代，開始有了改變。作為二次戰後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國，基於「平行戰略利益」的考慮，到了七十年代，開始和共黨世界中最頑強的中共進行「解凍」，並展開所謂「關係正常化」的「長征」過程。隨著中共進入國際政治舞臺，我們在外交戰線上，乃節節敗退：從聯合國的撤退，到世界上主要國家紛紛與我們斷交，乃至前年我們視為最忠實盟友的美國，竟在匆促之間，與我們斷絕外交關係。目前，在全世界一百六十多個國家中，與我們保持外交關係的，已愈來愈少，僅剩約廿一個；與「中共建交」的，卻愈來愈多，已超出一百個。我們與中共在國際關係上的根本轉變，不僅嚴重損及我們的國際地位和聲望，更使既成體系在內部遭受到空前的質疑、批評與挑戰。

既成體系在遭受到這樣空前的外交挫折之際，一度陷入空前的低沉與萎靡，但很快地，既成體系便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態度，來面對、並擁抱真實的臺灣。於是既成體系來到臺灣以後，前所未有的同時進行十項建設的壯舉，便在这种背景下，熱熱烈烈地展開，十項建設之後，又有十二項建設，建設的範圍也由物質的進行到文化的，由整體的大項進到

基層的小項。同時，一度因外交受挫而失去信心的民力資源，也在艱難生存的窘境與思慮後，逐漸發揮其潛能，展露其信心，其具體表現，就是在我們外交連環受挫的幾年，我們的國際貿易總額、經濟成長率 and 國民所得，無礙於政治的低氣壓，仍持續地保持上升與成長。這種現象，遂使這個時期的我們，呈現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

民國六十年代，外交的連環挫折，不僅使我們在國際上幾乎失去「自我」，甚至在國內也幾乎失去「自我」；既成體系以積極的建設吸收此一挫折，並以經濟發展反擊此一挫折，不僅使我們在國內外都恢復「自我」，更使我們體認到「自我」的價值與意義，並增加「自我」的責任與信心。

## 五、兩種反應

既成體系，在民國六十年代，不僅在外交與經濟上，呈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即在因國內部的挑戰上，也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民國六十年代初期，當既成體系剛從聯合國退出，而開始遭受到重大的外交打擊時，完全在既成體系教育下長大的知識份子，基於純樸的愛國心，和青年特有的熱情與使命感，也開始在臺灣主動推展問政運動。這個時候自由世界的主要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學生，都正發生如火如荼的，包括以激烈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既成體系不滿與抗議的學生運動。在這種世界性的風潮鼓舞下，面對國家週遭巨變，傳統上一向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終於從長期的冷漠中醒來，開始對他們置身的环境，進行有關大變局的思考，並勇敢地提出建言。在體制的禁忌下，他們拋棄西方式的學潮，而透過刊物、文字與座談，向既成體系表達他們的看法與願望；既成體系不但沒有進行壓制，也沒有肆行逮捕，在一定程度上，且讓他們暢所欲言，並順應他們的一些需求。既成體系這種反應方式，對於既成體系本身及參與此一階段問政運動的絕大多數者而言，在感受和比較上，都可說是相當暢快的。

但這種暢快，到了民國六十年代末期，已為之改觀。民國六十七年底，既成體系遭受到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外交挫折——美國宣佈與我斷交；正在急遽興起的問政運動，面對此一挫折，除使用傳統所用的透過刊物、文字與座談表達其看法與願望之外，也以三十多年來從未使用過的方式，包括示威遊行與巡迴演講，向既成體系提出最大膽的挑戰；而既成體系也以中央政府遷臺以後，三十多年來從未使用過的方式，包括全面大逮捕與大起訴，反應此一挑戰；這樣就爆發了三十多年來我們最大的內政整肅——高雄事件。

民國六十年代末的問政運動與民國六十年代初的問政運動，本質上，是相近的，連成一氣的。因為兩者都有共同的背景，包括既成體系已有一個鞏固的領導中心，具外交受挫，經濟成長；也有共同的追求，即改進既成體系。但兩者也有不同，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有兩點：

一、民國六十年代初的問政運動，成員都為知識份子，不僅份子較為單純，提出的要求也較為抽象，對既成體系的威脅也較小；但民國六十年代末的問政運動，其成員除民國六十年代初問政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以外，更包括經營界外的力量，這種組合不僅復元時的問政運

動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發言的分量，也對既成體系構成更大的威脅。

二、民國六十年代初的問政運動，雖然既成體系已有一個鞏固的領導中心，但另一個代表未來的新的領導中心也正在形成；而這個漸受公認、代表未來的新的領導中心，又和正在進行的問政運動有一種巧妙的配合，兩者乃得以順利開展；但民國六十年代末的問政運動，雖然既成體系，也一如民國六十年代初一樣，已有一個鞏固的領導中心，但另一個代表未來的新的領導中心，卻未能如民國六十年代初一樣正在形成，並和正在急遽興起的問政運動進行巧妙的配合。這種差異，加上民國六十年代末的問政運動，採用既成體系所不容許的「法定」活動方式，遂使既成體系，特別是其中的抑制主義者，得以「振振有詞」的理由，執行其抑制的工作。

從這種歷史觀點考察，高雄事件實代表既成體系對民國六十年代初以來，為因應國家遭受重大外交挫折而興起的問政運動的一個總結反應。這個總結反應和民國六十年代初的反應，大不相同，前者的吸納，使既成體系更為順暢；後者的抑制，卻使既成體系下的所有同胞，不論「本省外省，有黨無黨」，都感受到重大的創傷，甚至連既成體系的最高發言人，也都公開表示這是我們的社會經不起再度發生的「不幸」事件。

## 六、把持理想

嚴格而論，不論朝野，在高雄事件的表現，都一度顯得有些焦躁與沉不着氣；而高雄事件也一度假使朝野都受到迷惑，並陷於踟躕。痛定思痛之餘，分析這種親痛仇快事情之所以發生，歸根究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集結在臺灣地區的所有同胞，未能深察民國十六年之際，當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已變為大眾運動，抗日戰線因運動的發展而告分裂，而影響臺灣本土運動的兩大外來力量——日本本土的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近代國民運動，也因發展而陷於分裂時，蔣渭水先生向當時臺灣同胞所提出的兩句警語：「把持理想，凝視現實」。事實上，自民國六十年代初以來，問政運動與既成體系的一切爭議，其最主要的焦點，就是因既成體系不但未能在動態政治的運行中，對於渭水先生所說的「把持理想」與「凝視現實」二者之間，保持一合乎客觀需求的平衡，而且更明顯地以抹煞「凝視現實」的需求，作為維持此種不平衡的必要代價。

問政運動的一切努力，即為力爭這種不平衡，而使其平衡。這種努力，本來已愈來愈有成效，但高雄事件的發生，卻改變了這種情勢，不但一度加強此一不平衡的趨勢，甚至一度遮住既成體系對「把持理想」的追求。因此當既成體系在高唱療傷止痛的時候，首要的工作，便是既成體系本身，應堅定表示將繼續「把持理想」——將繼續承續祖先的共同追求，並以承續此一共同追求，作為既成體系統階段不容懷疑、也不容變更的歷史任務。既成體系尤應堅定表示：任何違背、扭曲、破壞或摧毀既成體系從事此一共同追求的因素、力量、決定與作為，不僅會陷既成體系於不義，更會使既成體系，在當前臺灣海峽兩岸的競賽中，失去

向全世界所有中華民族同胞進行政治號召的最有利武器。因爲今天的既成體系，對所有不同意以一九一七年的蘇聯模式，解決中華民族往何處去的同胞而言，實代表一最後的據點，最後的歸宿，和最重要的復興基地。

然而，在既成體系經過三十多年的平靜後，一種有損於我們從事此一共同追求的因素、力量、決定與作爲，卻在神秘的氣氛下，在臺灣地區，若隱若現。這種神秘的氣氛，在我們古老的歷史上，實是老生常談；即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期，也是司空見慣；但這種爲中華民國開創者孫中山先生，以及所有開國先賢先烈所極欲去之、且已去了三十多年的神秘氣氛，竟在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唯一剩下的一塊有效管轄的清靜地區，像幽靈一般，飄來飄去，而勾起人們無限慘痛的回憶。對於這種神秘的氣氛，以及其在心理上可能引起的不良反應，和在政治上可能引起的惡性循環，既成體系不但有責任，更有義務，要從根掃除。因爲既成體系如果不能從根掃除這種神秘的氣氛，不但會失去其立國之本，甚至也會失去其奮鬥及生存的意義。

經過高雄事件的創傷，隨着神秘氣氛的陰魂不散，以及國際局勢的迷惑性發展，既成體系現在實比任何時期，都更需要以堅定的決心、意志與力量，抗拒一切形形色色的誘惑與壓力，繼續爲遂行祖先的共同追求而奮鬥不懈。

### 七、凝視現實

既成體系目前不僅更要「把持理想」，也更要「凝視現實」。經過一連串的外交挫折與問政運動的衝擊以後，今天的既成體系，不管任何人主政，不僅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以不理不睬的態度，漠視現實的需求，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以「把持理想」爲藉口，敷衍現實的需求。事實上，可以這麼說，「凝視現實」將成爲今後主政者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政治誠律。

今天的既成體系，最大的缺陷，就是它不但不能「凝視現實」，而又緊緊抱住卅多年前選出的公權機構，更莊嚴這些公權機構及其成員，稱之爲「法統」，且堅持此一「法統」爲「把持理想」不可分割的部份。這種法統架構，不僅一度成爲既成體系團結的象徵，也長期維持既成體系的安定；但隨着國際關係的銳變，當既成體系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現階段，在實質上，與臺灣已愈來愈變成二位一體時，這種法統架構，不但在理論上和心理上，都受到空前的質疑與批判，實際上，更由既成體系最重要的團結象徵，變成爲既成體系最大的團結障礙。

僵硬與龐腫是現行法統架構的孿生兒，也是既成體系的主要特徵。可以預料的，只要臺灣海峽兩邊的情勢不變，既成體系的法統架構不變，法統的成員不因自然或人爲因素而發生突變，任何有關充實既成體系的決議與方案，不管既成體系下的宣傳媒體如何加以美化，在現行條件下，都無法改變既成體系的此一特徵，也無法改變法統架構的此一特徵。即以此次政府宣佈，定期辦理民國六十七年底，因中美斷交而暫停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並增加其名額的決定而論，就其增加的比例及增加的分配方式分析，不難看出，不管在比較具有競爭性的地區，選舉的結果如何，既成體系仍然穩穩享有支配地位，法統架構也不會受到任何實質動搖。不過，不可否認，這到底是一項應受到歡迎與肯定的決定，因爲這項決定代表一



喜訊，一重要的選擇，和一有意義的跨步。這是到目前為止，三十多年來，既成體系在臺灣地區，在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問題上，所做的最「凝視現實」的一項決定。但當既成體系經過這麼多年的呼籲，且剛經歷像高雄事件這樣重大的創傷，而所做的跨步又是這樣不足以影響大局的安排，也可充分反證出，法統架構在既成體系之下佔有何等重要地位。

但既成體系所應受到的批評，並非它的「方向」，只是它的「現況」。由於既成體系所遵循的「方向」，代表廿世紀初以來所有中華民族祖先的共同追求，也代表現在及未來世世代代中華民族同胞的共同追求，這種「方向」，不但不應受到批評，更應加緊努力推行。但既成體系的「現況」，卻扭曲此一「方向」，妨礙此一追求，因此為了貫徹所有中華民族同胞的共同追求，全國上下，自有共同的責任與義務，針對既成體系的「現況」，力求改進，使「現況」能與「方向」一致，並為「方向」服務。而在這個改進過程中，最根本的癥結，厥為打破法統架構，並恢復政治主權的至高地位。只要政治主權的至高地位，能在實際政治中完整地落實，不僅可打破既成體系的僵硬，而共法統架構，在自然邏輯的發展下，自有如江河日下，不能自己。但截至目前為止，包括最近一次有關充實既成體系的決定，其考慮的最高着眼，都是維護法統架構的尊嚴，更甚於對政治主權的尊重。

為了避免既成體系更加僵腫，今後有關政權與治權、中央政治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行政級數的調整等問題，實不應再以「應急」的方式處理，而應在「把持理想」的原則下，經由全盤的思考解決。如果我們不能經由全盤的思考，而仍以「應急」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將會陷於一面解決老問題，一面卻製造新問題的作繭自縛的漩渦中，而不能自拔。這種短視而不負責任的態度，絕不是任何以大型人物自期自勉的政治家，所應有的手筆與風範。

## 八、歷史任務

既成體系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應在復興基地，實現祖先的共同追求，並使其更加完美，以求「先為不可勝」。這個理想的主要內容，包括建立一個主權真正屬於國民全體的主體制，再經由民主體制，來「鞏固國權」、「保障民權」；而其具體指標就是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與社會福利。

高雄事件一度掩蓋了這個視線，並掩蓋了這個心靈，但任何形式的高雄事件，都無法永遠掩蓋這一視線與這一心靈。因為這個理想，不僅代表廿世紀初以來所有中華民族祖先的共同追求，也代表現在及未來世世代代中華民族同胞的共同追求。任何團體，不管以任何形式，運用任何權力，一旦違背、扭曲、破壞或摧毀此一共同追求，從長期觀點言，終將為洶湧澎湃的歷史浪潮無情地衝落。

但經過高雄事件的創傷以後，對於此一已經過三十多年漫步的共同追求，在最需要既成體系以實際的行動表示真正的抉擇時，集結在臺灣地區的所有同胞，理應以堅定的信念，自覺地承續此一共同追求。同時，當此一共同追求，正受到三十多年來最嚴重考驗的時刻，集結在臺灣地區的所有同胞，也應深刻地體認，唯有以真正的抉擇與信念，承續此一共同追求，我們才有資格說已克盡現階段的歷史任務。因為此一共同追求，從縱的觀點言，不僅代表香火承續；從橫的觀點言，當民氣正告低沉之時，更代表警鐘的作用。

基於此一認識，現階段的歷史任務，絕不在黨派之爭、地域之爭、國會席次之爭、乃至瑣碎問題之爭，而在於確立此一共同追求，並爲了實現此一共同追求，必須對有礙於此一共同追求的任何障礙，進行掃除的工作。根據此一結論，既成體系也只是一個工具，一個籌碼，其目的在有利於此一共同追求的達成。如果既成體系喪失此一作用，或妨礙此一追求，基於歷史任務的需要，自有責任，也有義務，要對既成體系進行適當的調整或改造。因此，對既成體系的任何評論，不管是維持或改進，都應以既成體系能否促進此一共同追求，作爲考慮的最高依據。

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在顛覆的政府，帝國主義的荼毒，以及軍閥的蹂躪下，交織着同胞的血與淚，掙扎與失敗，追尋與痛苦，寫下了最慘痛的一頁。整個民族在長期的挫敗中，經歷了自傲與自卑，也開始從反省中覺醒，並試行探索，但由於世界性的波浪已衝破任何孤立的海岸，倉促之間，我們只能在患難中求出路，在實踐中求經驗。在大約一百年的奮鬥歷程上，我們雖然經歷過啓蒙期的百花齊放與論戰期的思想爭鳴，國內的政治力量雖也經歷過縱橫捭闔與悲歡離合，但是像我們這樣有悠久歷史而偉大的民族，卻從未能在極端困境的挑戰中，發展出一種真正偉大而深厚的思想運動，作爲統一國家與建設國家的指導力量。思想運動趕不上實際運動，實際運動有如脫韁之馬，不顧路線、節奏與旋律，而到處奔跑亂撞，這正是造成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悲劇的最大癥結所在。

經過這樣慘痛教訓的既成體系，基於當前國際局勢及臺灣海峽兩邊情勢可能發展的考慮，今天，在臺灣地區，實比近百年來的任何中華民族政府，都有更好的機會與條件，發展一種代表中華民族未來思潮的偉大的思想運動。日據時代，日本人說臺灣因爲屬於日本，臺灣可以成爲「文化的拿破崙」；現在我們應該說，臺灣因爲屬於中華民族，臺灣可以成爲「文化的拿破崙」。既成體系不但應以此一重責大任自期自勉，且應更進一步，引導臺灣也成爲「思想的拿破崙」、「體制的拿破崙」以及「經濟的拿破崙」；這也正是既成體系雖立足以臺灣，但從整個中華民族角度思考，對中華民族所應肩負的重責大任。

但這種爲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同胞所未能達成的重責大任，今天既成體系的「現況」不但無法勝任，甚至剛好成爲其負擔。因此，如何改進既成體系，使其能肩負此一重責大任，便成爲現階段我們爲克盡祖先共同追求與歷史任務的必要手段與必要過程。這不但不是破壞既成體系的表現，相反的，這正是愛護既成體系的表現。當既成體系經過多年的挫折與低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業績與活力，表現出高漲的信心之際，爲了促進全民的更大團結，並增強四海同心的政治號召，既成體系處在當前最有利的歷史契機，實有必要以最大的決心與氣魄，對既成體系進行適當的改造，使其在「把持理想」與「凝視現實」之間，能保持合乎客觀需求的平衡。我們深信，唯有經由適當改造既成體系的歷史性「一躍」，既成體系才真正能奠定「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有利形勢，並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機運，同時更影響並掌握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

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 民主的社會主義

—文凡節譯—

楊青矗說，要達到民生主義的均富目標，必須讓工人在工作的工廠分紅入股，使人人都是工人，人人也都是老闆，資本大眾化，工廠由閉塞的家族工廠成為開放的工廠。

## 一、前言

韋氏的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定義社會主義為「一種經濟及政治學說，主張生產工具及產品分配的擁有權及行政權由集體或政府來執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學家 Carl Landauer 提出另一定義：「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擁有的體系，它的提倡是為了要尽可能平等地分配收入，財富、機會及經濟力量。」(European Socialism: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ovements, I, 5)

如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定義種類繁多，這是因為社會主義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及形式。例如，人類歷史上已經有烏托邦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的社會主義，修正的社會主義，費迪社的社會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工會組織主義以及這些主義的混合或分派。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民主的社會主義，也是最成功的非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

一般說來，「社會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概念，而「民主的社會主義」指的是一種意識型態，以經濟及政治做基礎。在民主

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中，該主義雖有各種不同的意義，不過有一些特徵是不變的。

若要進一步分析民主的社會主義，讓我們先列舉它的一些特徵：

- 1) 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堅守民主政治體系的。它充分支持個人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選舉自由，宗教自由，文化自由以及要求法律公平。它在理論上及實踐上都反對少數人施行暴力的合法權。簡言之，它充滿濃厚的民主信念氣味。
- 2) 不同於共產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認為國家並不是過渡的必然罪惡，而是必要的權宜結構，人民透過它來達到並維持社會主義的目標。
- 3) 民主的社會主義並不要求經濟生活的整齊國家化。
- 4) 民主的社會主義以民主漸進的方式來消除階級間的對立。
- 5) 民主的社會主義並不局限於任何經濟決定論的論調。不同於共產主義所謂的歷史必然性與社會發展法則，民主的社會主義強調人的意志與努力。

6) 民主的社會主義不主張個人崇拜，一切事務由民主方式來決定。

做為一種意識形態，民主的社會主義比馬克思社會主義穩健溫和，更容易被人接受較少獨斷性。另一方面，對於主要的國家工業，它贊成公共的擁有權。它一直反對資本主義下的利潤體系與惡性競爭。它認為有必要透過教育的方式，使人們在根性上以公共的需要為優先考慮，然後才考慮個人的利益。它積極制定廣泛的國家計劃，認為市場體系使得生產資源耗費在次要的物品及服務上，而犧牲了住宅、教育、自然保護及城市發展等的迫切需要。它深信經濟不景氣可以避免，只要國家能朝廣泛的經濟秩序方向發展。它贊成財富分配，容許富人与窮人之間適度的收入差額。（實際上蘇聯並未做到這一點）。它的信念是一個完整的“福利國家”。它希望清除特殊的特權人士，而為所有的人創造更公平的機會。它廣泛的同情，繫於勞動的階層之上。

但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却不為共產主義者所諒解，後者認為民主的社會主義是異端的運動，不忠實於馬克斯，只有推慢歷史發展的過程。民主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太教條化，有損民主的價值；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看來，民主的價值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目標對人類是同樣適當的。

## 二. 社會主義的早期發展

十九世紀民主觀念的成長，使得某些觀察家下了結論，認為若沒有經濟的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完全的。他們認為政治民主被經濟支配者的政治力量所打破，因此，政治民主

的表面雖很吸引人，但經濟的實體才是確實可靠的；只有透過社會主義以保障所有人民的經濟權利與物質福利，才能實現更深一層的民主的含意。

平等觀念一直是民主思想的基礎。它也同樣成為社會思想的主要根源。所有的人基本上是平等的，這個信念引出了一個論點，認為整個社會所要追求的不僅是平等的政治權利與平等的人類尊嚴，還要為人類設計一套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能以平等做前提而盡可能地分配物資，創造一個更和諧的社會。

雖然法國大革命包含了深層的民主政治概念，不過它的理論基礎還停留在經濟的個人主義上。它假設了以私有財產做基礎的經濟體系，容納經濟的放任主義，財產擁有者從這種主義中獲取毫無節制的利益。但是當工業革命加速了工廠體系的運作，並帶來悖謬與非人道的副作用時，私有財產制就得重新予以評價。雖然有些有心人試圖尋求改良放任主義的罪惡，但另一些人開始察覺私有財產制本身是不正義與災難的基本原因。在歐洲，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在現存體制下從事改革，另一派主張澈底剷除私有財產制。於是，歐洲開始流行社會主義思想。

簡言之，民主觀念，工業革命，以及人類對正義的無止盡要求，都是產生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因。在這裡，我們談到社會主義在歷史上的演化。

柏拉圖早就認為財產的共同擁有，可為人類的德性與社會的和諧帶來最理想的安排，但他承認在實行上會遇到困難。在共和國一書中，他提議統治階級及武士階級應該完全放棄私有財產的擁有權，而在法律一書中，

他要求土地均分，認為每個市民的个人財產額不超過四倍於他分別的土地價值額。柏拉圖認為經濟的不平等是市民騷動的主因，希望能把這種不平等重新調整到社會無害的地步。

在最早的社会主義團體中，早期基督徒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希望把與耶穌基督有關的一些原則，運用到實際社會上。他們的實驗雖然是短暫的，不過他們的財產共同擁有的觀念却持續於整個中世紀。他們一致認為私有財產制是人類墮落的不幸的制度。

反映這種概念的第一次政治運動，發生在十七世紀中期。Gerard Winstanley為一個名叫“挖掘者”(the Diggers)的英國團體發言時，論證說自然本身已指示了財產的共同擁有而這種擁有順乎人類的自然狀態的。他認為私有財產的擁有殘害了人類的貪婪，暴力，墮落與貪污。他深信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除非人類能平等地蒙受自然的恩惠。在他的模態社會裡，土地生產的成果是共同擁有的，按照人的實際需要而分配。同一時代，在英國，一位“平等主義者”(the Levellers)的代言人，也曾表達了他的一項政治觀點：“我確實認為在英國最窮困的人也能與最偉大的人擁有相同的生活”。這位代言人就是John Lilburne，他想要革除英國政壇上的特權，為公民贏取選舉權，以及在法律之前充分的平等權。他的政治觀念後來成為社會主義者在經濟領域內的指揮。

社會主義的更核心的思想來源，可以在法國找到。Daniel Bell曾寫道：“如果社會主義的重心可以在社區的觀念內找到……那麼當代社會主義的種子可以在盧梭的思想內發現到。”(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V, 507) 盧梭的平等主義以及他強調社區

的重要，在精神上是與社會主義者的情操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他強烈攻襲所謂“自然權利”的觀念，因為那種觀念認為私有財產的擁有高於社會的需要。盧梭認為所有的人的“權利”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社會之前的狀態。自然人無法擁有“權利”；只有社會的成員，才能學習到語言，使自己文明化，以及獲得權利的概念。因為權利起因於社會，所以社會能夠決定權利的分配以及界限。誠如盧梭所說的“個人對於自己財產擁有的權利，總是附屬於社區要求所有人的權利”。(參看盧梭的Discourse on Inequality，對於他的觀點有詳細的分析)。盧梭的深思的分析為公共擁有權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不過他似乎比較贊成財產的公平均分，而不贊成這種財產的集體化。

在法國大革命時，思想成熟的積極社會主義者 Francois Babeuf 曾尋求消除私有財產制，以建立平等的生活標準。像許多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深信，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免除“罪惡……貪婪，嫉妬，不知足，驕傲……簡言之，所有罪惡”。但 Babeuf 的 1796 年的“平等計謀”，因缺乏群眾基礎而失敗。(若要了解 Babeuf 在法國大革命中的角色，請參看 Edmund Wilson 的 To the Finland Station 第一章第二部分。)

### 三. 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發展的第二个階級，是所謂的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其時在 1815 到 1860 年之間。“社會主義”一詞是法國哲學家 Saint-Simon 的一位門徒於 1822 年所創，1826 年該名詞開始出現在出版物上。第一篇討論社會主義的論文於 1835 年出版，作者是 Pierre Leroux)。這時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是世俗的人

道主義者，對人類所受的災難感到不滿，為了尋求改善他們悲慘的命運，就從教育議員及工業界的人士以喚起其責任心着手。另一些社會主義者發覺他們如人道的良心始終受着基督教的原則所鼓舞。還有一些社會主義者是社會的夢想者，他們相信以集體主義者的路線從事整個社會的徹底改造，會帶來完整的，有秩序的以及和諧的社會環境，而進入人類高品質的發展；他們同時代的 Karl Marx，站出來批評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社會改良主義以及一般的資本主義社會。

法國的哲學家及社會學家 Saint-Simon (1760-1825)，雖然相信大工業家是社會的自然領袖，不過他的許多觀念却為後來的社會主義者所襲用或強調。同馬克斯一樣，他看到經濟的變遷是歷史演化的主要因素，而且整個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然而他描述及預期該鬥爭的衰微而不是增強。Saint-Simon 也許是第一個社會批評者而能認識到在工業社會裡的大幅度經濟計劃的需要。(參看 John Plamenatz 的 *Man and Society*, P.53)。根據 George Lichtheim 的說法，Saint-Simon 及其跟隨者比“其他社會主義者(除了馬克斯主義者以外)更有計劃地要把我們的世界理想化。”(參看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P.40) 他們拒絕土地均分的理論，而且承認當代的產業主義是經濟富裕的主要來源；他們相信科學，而且深信與人類彼此互相剝削，毋如大家共同開發自然資源——所有這些主張對於社會主義思想是有很大的影響的。誠然法國一位卓越的社會學家 Emile Durkheim 認為 Saint-Simon 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之父。

在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中，威爾斯的好社會改革者 Robert Owen 擁有他卓越的地位。他不

滿意他國家內紡織廠的工作條件，在那裡，八歲以下的孩童受雇工作相當長的時間，小小的身心都遭到相當大的損害。Owen 是個人道主義者，道德家，而且也是個成功的企業家，他根據他的高尚原則，管理他在 New Lanark 的棉花廠。他減少成人每天的工作時數到 10 個半小時，改善工人的居住及工作條件，拒絕招雇 10 歲以下的孩童，堅持在那種年齡以下的孩童應該接受教育。他深信人幾乎是環境的產物，而且相信普遍教育可以減少社會的邪惡，以期穩定地提昇人類到更高的福利及道德水平。

Owen 充滿希望與熱情，試圖勸服其他的企業家跟隨他的實驗。向他們保證那樣的管理是好的企業管理，他論証道“……你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用在密切地瞭解這些無生命機器的各部份之間的關係，想要改進它們的有效力量，以數學的精密度去計算它們每分每秒的整合運作……你們為何不花部分的時間，更有利地用在改善你們的那些有生命的機器呢？”(參看 *European Socialism: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ovements*, by Carl Landauer P.48)。

因為其他企業家有意遵從他的建議，他於是支持工廠立法以糾正工人的被虐待，後來又鼓勵工人組織一個龐大的工會以促進他們的共同利益。他要求建築工會利用 Grand National Guild of Builders 以控制建築工業(參看 G. D. H. Cole 的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第一卷 P.123)。

在社會主義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是 Louis Blanc。誠如一位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學家 G. D. H. Cole 所評價的：“就許多觀念來說，Louis Blanc 可謂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一位先驅者。”(*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P.176)。

Blanc在勞工組織 (Organization du Travail) 一書中表現他的大部份觀念，他提議由國家出資以建之大量的“國家工廠”。這些工廠由一些以民主方式選出的官員來管理，每年除了再投資的資金以及補助非營利但重要的企業的補助金以外的其餘利潤全部分配與工人。由於高工資，良好的工作條件以及有保障的工作，因此這些工廠吸引了不少有能力而且熱心的勞工，使工廠的運作達到最高效能，也因而漸漸取代私人的工廠。在開始的時候，工資雖然有差別，但到了最後，工酬也就等齊了。Blanc創造而且普及一項標語，即“按各人的能力而出力；按各人的需要而分配”。Cole 摘要地說：“他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建立在公共的擁有之上，由工人控制工業，開創民主議會體系以監護工業的民主，以期能按各人的需要分享社會的成果。……”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P. 176)。

德國一位社會主義者 Edward Bernstein，可以說是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非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中，他担負了主要的角色。在十九世紀後期，他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與馬克斯唱反調——否認資本主義將滅亡，產業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工人階級的命運將更惡化，也否認歷史的唯物史觀是正確的，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必然是反動的。他不相信無產階級將推翻整個國家。

“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在十九世紀中期始出現於英國。他們擁護工廠改良以及保護勞工的立法，也批評資本主義的體系，堅信資本主義體系與基督教原則在基本上是不一致的，他們聲稱基督精神是互助合作以及兄弟愛，而資本主義精神是貪婪，不知足，互爭以及崇拜物質主義及金錢萬能。基督

教的社會主義者控訴資本主義體系刺激了人性最自私及最貪婪的一面，這與基督教信仰相衝突。除了關心個人心靈的拯救之外，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也關心政治及經濟秩序；他們聲稱基督的主要言行是關心平民的物質福利；而不浪費在神學理論的信條與宗教儀式上。

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在英國有很深的群眾基礎，Charles Kingsley 以及 Frederick Maurice 兩位牧師是這方面的代言人，Kingsley 的基督教的民主概念可以用下文做個總結：

“我宣稱，上帝派遣一位基督聖徒來到這個基督教的國家，他的主要使命是宣講自由，平等與兄弟愛的最深廣而容易被人接受的意義；在他的工作範圍內，他是一位真正的聖徒，依上帝的意志與福祉而行。所有贊成資本累積在少數人之手的社會體系，把眾人趕出他們祖先開墾的土地的社會體系，以及把他們降為農奴，按月計酬的工人的社會體系，都有違耶穌所宣告的上帝王國的條件。”(參閱 Walter P. Hall, Robert G. Albion 與 Jennie B. Pope 合著的 A History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 第二版 P. 778)。

有一位很有影響力的英國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他的政治經濟的原則為十九世紀後期的許多大學所採用，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也是有貢獻的人。他主張限制私人企業，支持社會服務，以及藉公共的行為重新分配收入，這些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在討論某項意見時，他寫道：

“如果要在社會主義以及目前災難性的與不正義的社會二者之間做個選擇，如果私有財產制帶來了產品與勞力不成比例的分配，最大的配額給那些不曾工作的人，次大的配額給那些有名無實的工作者，而最少的配額卻給付出勞力最多的人；工資愈來愈少，而工作愈來愈沉重，直到消耗殆盡的身體儘管努力勞動也無法獲取足夠生活的必需

品；如果社會主義是另一種人類可行之道，那麼社會主義所面對的大大小小的困難，也就不足道了。”（參閱 *Political Economy*, 第二卷，第一章，第三節）。

在英國社會主義的演化中，另一個劃時代的人物是一位非社會主義者 Henry George。George Bernard Shaw 寫道：“當我投入 1883 年偉大的社會主義復興運動時，我發現跟我一起投入的人約有六分之一開始轉而信仰 Henry George。”（錄自 Francis W. Coker 的 *Recent Political Thought*, p. 98）。Henry George 相信人的土地擁有是源自歷史的大錯；由於少數人擁有土地，會產生最大的社會病態。不過，他並不贊成在當時的文明階段中把土地社會化，反而提出依照土地價值扣稅。依照 E. R. Pease 的說法，Henry George 的整個學說“在提出一種財富分配方法，依照此法，財富大致可相對應於價值；工作的報酬給與那些真正工作的人；富人与窮人的階性同樣都消失；……財富……依照公平与平等，分配給那些生產者。”（參閱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p. 20）。

Henry George 的進步与貧窮（1886）不僅對英國知識界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導致英國的一連串稅制改革。最重要的是，George 以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的形式，加速了社會思想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英國的政治面貌。

#### 四：費邊主義者

到 1880 年早期，社會主義在英國一直進展很慢。不過當一群卓越的知識份子於 1884 年組成費邊社時，也就有了“……許多不自覺是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者。”（參閱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p. 53）。

費邊社的核心份子 Sidney Webb, George Bernard Shaw, H. G. Wells, Graham Wallas 以及其他人物，相信他們已看到了歷史正穩定地朝

著民主与社會主義進展。為了促進民主的社會主義成長，這群費邊社的人開始編寫一系列的小冊子，準備教育上層与中層階級的人，使他們擁有社會主義方式的智慧与正義。

費邊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否認馬克斯的勞工價值論，認為價值原本是文明發展的產品，而不是勞工用手製造出來的產品。他們又補充說資本家能賺錢，與其說是因為他的商業頭腦，不如說是因為他的經商地真好，消費人口漸增，這些都不是出自他本身的力量。

他們也看到了存在於社區与投資者（而不是領薪階級与資本家）之間的主要的社會衝突。投資者過份的權利，但他們不在親自經理他們自己的企業，經理權反而落入公司的經理們手中，形成一種稱為“私人集体主義”的体系。因此“每年產生的大部份錢財流入社區裏小部份的人的口袋，但他們付出的服務卻很少，甚至沒有，而且……大眾的貧窮，並不是來自貧窮大眾他們個性的缺陷，而是因為國家的股利落入土地与資本擁有者的手中。”（參閱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p. 70-71）。

因此，一個合理而且重視道德的社會，必須贏回它所創造的價值，以免由資本家所獨佔。這可由逐漸把土地及資本裝備歸還給社區（而不是歸還給無產階級）而做到。費邊主義者下結論說，國有化應該可以一步一步來到，因為整個社會預備著有效地掌理工商企業。而且，資本家可以因自己的付出而至少得到部份的報償。

費邊主義者深信理性的力量。身為理性的人，他們相信人對正義与公平的崇敬，可以為社會帶來理性的改良，只要社會罪惡的一面能被清楚而誠懇的提出來。他們覺得人們可能在抽象的理論層面無止盡的爭論下去，在會更容易同意有嚴密事實資料所支持的政策改良。所以，他們專心致力的並不是溫室裏成長的哲學思索，也不是表揚一些革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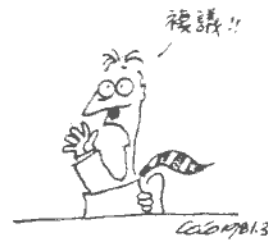
英雄事蹟，而是詳細地而批判性地分析現存的社会事態，並提出一些實際的、具體的以及詳細的計劃，用來糾正一些社会的病態。他們所從事的改良工作已超出國有化的範圍，涵蓋了稅制、城市計劃以及社会福利立法。雖然費邊主義者彼此對於許多觀見具有強烈的爭執，不過他們訂了一些共同觀見的原則，詳細記載在系列的小冊子上。根據那些小冊子，他們致力於立憲政治，合理的社会改革，以及在經由觀見討論之後贏得大多數人同意的社会主義。他們知道要贏得大多數的人的同意，並不是一朝一夕可達到的。不過他們願等待大眾的意見同意他們的目標。他們的工作，第一專注於民主，其次是社会主義。

因此，他們所憧憬的新秩序，是要透過民主過程而達到的；之後，又擴展民主的本身，以臻於和諧的社会秩序。融合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將使民主理想更完善，並疏通不礙人類進步的經濟障礙。

在人類史中，很少有像費邊社那樣的一小群知識份子，能對他們的國家的歷史產生那麼有意義的衝擊。費邊社的成員對社会的衝激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他們是理想與現實的結合，他們很準確地測量出他們國家歷史發展的潮流，然後設計一套可行的辦法，以處理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與需要。英國的工黨從費邊主義中汲取他們的智慧食糧，而且發現費邊社的溫和政策很投合他們所面臨的實際需要。1924年 Ramsay Mac Donald 首相當政的政府，雖然缺乏議會的力量去推行一項社会主義政策，但1945年 Clement Attlee 當政的工黨政府却能很順利地推展費邊主義者的計劃。

(下期續完)

阿諾從政記  
制衡力量



East Lansing 消息、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OSDMT) East Lansing 分會已於五月二日在 East Lansing 正式成立。成立當天並請艾琳達到當地做有關台灣民主運動的報告。  
又原先在芝加哥主辦的《民主消息》，以後將由 East Lansing 分會主辦。



# 新鏡花緣

·李汝珍·

話說林之洋等人離開君子國，一路風帆順利。這船走了幾天，忽見前面似烟非烟，似霧非霧，有萬道青氣直衝霄漢，烟霧中隱隱現出一個島嶼。林之洋道：「這城池倒也不小，不知是甚麼地名？」多九公把羅盤庚向，望一望道：「據老夫看來，前面已到了閉嘴國了。」

唐敖道：「這地方山秀水清，看來是個美麗寶島。我們何不上去看看？」

多九公道：「這個閉嘴國專門結交世界上的超級小國，與我中原素無來往，所以不能上岸。」

林之洋道：「不能上去倒是可惜。據說這裏的人也是炎黄之後，穿著唐衫唐褲，說的唐言唐語呢！只是不知道為何取個閉嘴國的名字？」

多九公道：「這有兩個原因。第一，這美麗寶島本來還有幾個直言敢諫的讀書人，可是那皇上只喜歡聽一些奉承拍馬屁的話，就把那些辦雜誌，說些逆耳忠言的人，一個個抓將牢裏去了。三十年來，雜誌被封的封，人被捉的捉，現在還有誰敢說真話呢？」

唐敖道：「那麼另外一個原因呢？」

多九公道：「第二，這地方的人最時興開會。除了立法院、監察院以及各級省縣市議會外，還有國建會、陽明山會談、教授春節年會、黨代表大會、鄉鎮長座談會、教育會議……。三十年來，所有的弊端，所有可能的建議，都有人在各種會議

上講過了。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既然大家說話都像放屁一樣，那麼有誰願意再講了？」

唐敖道：「怪不得今年2月12日聯合報的黑白集，說今年的教授春節年會，教授們『大智若愚』『深藏不露』。」

多九公道：「這正是國家新形象呢！教授們也知道，所有興革的建議早有了講過了，再講也不過是炒冷飯；而且講多了說不定還惹來殺身之禍呢！倒不如來個沈默是金！」

一行人說談之間，船早已過了閉嘴國甚遠。大家不再扯談，就在船艙裏擺起麻將。後人有首虞美人，專說閉嘴國監獄裏的書生：

禁書抓人何時了，冤獄知多少？老劉昨夜又失蹤，據說已在軍法審判中。刑求疤痕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廟公碰到乞丐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支加哥總會消息·

本會設立的電話電台：“民主之聲”第二站，已經在支加哥設立了。電話號碼如下：(312) 667-2745。歡迎收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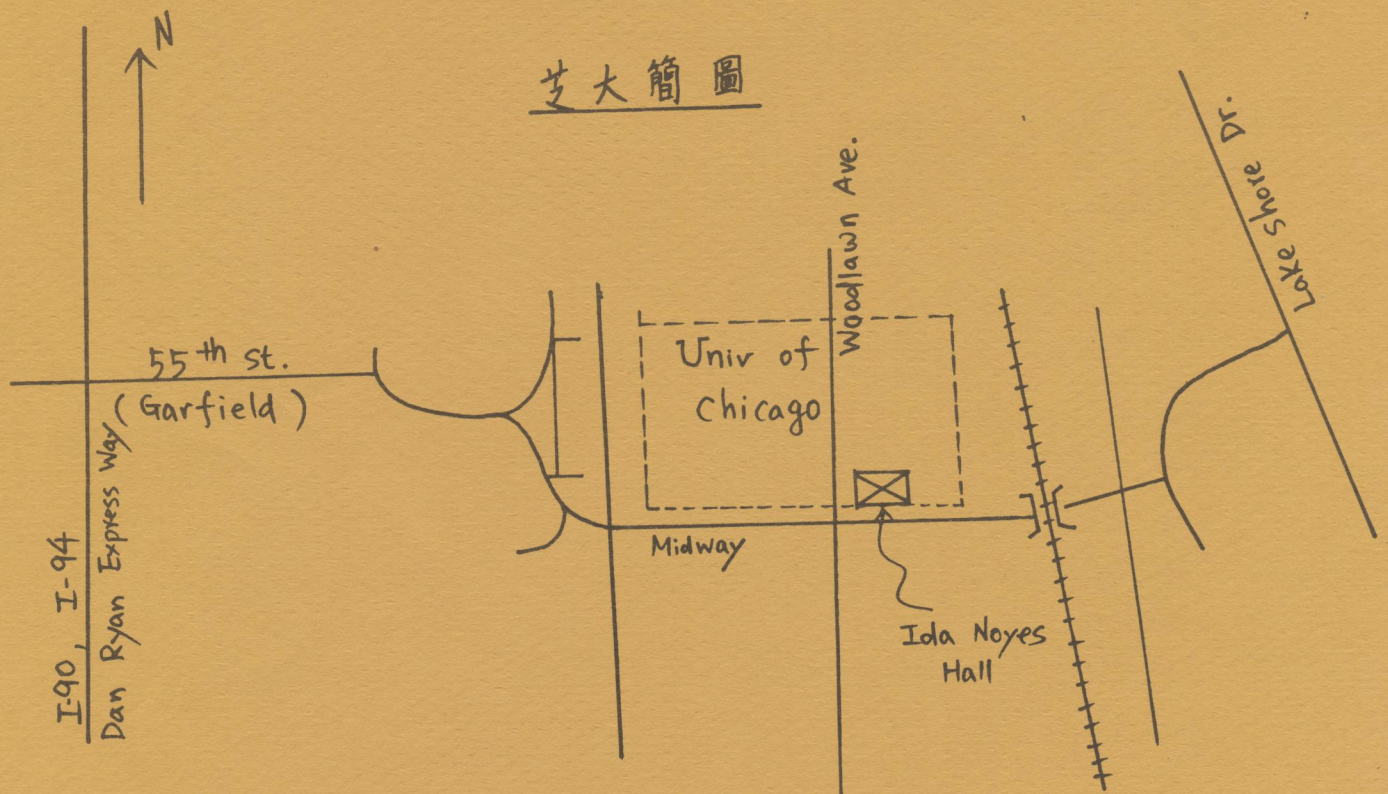
# 陳若曦演講

時間：5月23日（星期六）下午2點。

地點：芝加哥大學 Ida Noyes Hall。

題目：民主牆與民辦刊物。

繼下午的公開演講外，當日晚上並有聚餐及繼續自由討論。歡迎參加。演講地點請參看附圖。本公開演講會是由芝大中國同學會，芝大台灣同鄉會，芝大梅社及本會合組籌備會共同主辦。



# 目錄

• 1981年4月5日 第25期 •

	<u>頁數</u>
<u>瞭解台灣</u>	
• 李文仁 • 回鄉行的見聞和觀感	3
• 資料組 • 張春男的自辯書	11
• 黃煌雄 • 當前民主運動的歷史任務	28
競選傳單	27
<u>世界知識</u>	
• 資料組 • 揭穿韓國經濟奇蹟的神話(下)	14
<u>文化思想</u>	
• 文凡 • 民主的社會主義	35
<u>文藝</u>	
• 李汝珍 • 新鏡花緣	42
<u>支援會通訊</u>	
• 財務組 • 捐款報告	26
<u>其他</u>	
• 資料組 • 陳若曦演講海報	43
<u>編者的話</u>	2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  
60653 USA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TO: